

【论 文】

关于新疆文化建设的对话¹

王立胜、姑丽娜尔·吾甫力²

摘要：本文是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与新疆喀什大学教授姑丽娜尔关于新疆文化建设的对话。王立胜 2010 年起任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2012 年至 2015 年任中共喀什地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喀什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姑丽娜尔教授是喀什文学史研究的著名专家，新疆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二人以问答的形式，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新疆的历史、宗教、文化等重要问题。

关键词：伊斯兰文化；新疆文化；喀什噶尔；《古兰经》；文化本质；福乐智慧；喀喇汗王朝；新疆发展；阿拉伯哲学；泛伊斯兰主义；

王立胜：姑丽娜尔教授，您是研究喀什文学史的著名专家，也是研究新疆文化和社会问题的知名学者，我读过您的很多著作，虽然见面不多，从您的著作中收益良多。这对我了解喀什和理解新疆有很多帮助。今天跟您见面主要是想请教一些问题。首先请您谈谈喀什历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

姑丽娜尔·吾甫力：在维吾尔族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每个时代都有相应的思想家出现。从公元十世纪前后的喀喇汗王朝起，喀什逐渐成为西域乃至中亚的政治、经济、学术中心。从文化、学术上来说，有当时的高等学府，学者云集，著书立说，交流思想，有“小布哈拉”之称。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马哈穆德·喀什噶里、艾合买提·玉格乃克等，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但因为我们对这些思想家了解的不够，加之那个时代的特点，思想家们的思想学说是以诗歌为载体。也就是说，维吾尔族的思想家首先就是诗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们的诗歌中。今天的我们却仅仅把他们作为文学家来研究，并没有从哲学的高度对他们的思想学说进行研究、整理。目前还没有史料能考证他们也像战国时代的中原思想家们一样展开不同流派的学术辩论，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等流派；也还不能确定是否像柏拉图一样著书立说，供后人去研读。所以今天的维吾尔族学者们一般把他们的诗歌作品仅仅作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实际上，《福乐智慧》就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它讨论国家的形成、目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如何治理国家等。从伊斯兰文化对人类的贡献角度来说，著名思想家、翻译家法拉比在公元 10 世纪前后翻译、注释亚里士多德大部分的著作，将其介绍给阿拉伯世界，同时，在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后来西方的学者从他的著作中找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在欧洲都已失传的著作。

王立胜：您说得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复兴，很多内容都是通过伊斯兰文化这个中介来复兴的。文艺复兴之前，古希腊、罗马文化好多都失传了，到了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是通过伊斯兰文化整理、挖掘、抢救出来的。不仅要研究文艺复兴的内容和人物，还要研究文艺复兴历史过程的一些细节，这和研究它的历史一样重要。我最近读过一部研究科学史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有两章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所以您讲到在法拉比的著作中发现亚里士多德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伊斯兰文化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阿拉伯历史上的百

¹ 本文刊载于《东岳论丛》2016 年第 7 期，第 5-18 页。

² 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姑丽娜尔·吾甫力，喀什大学教授。

年翻译运动。百年翻译运动是在阿巴斯王朝时兴起，目的是学习整个人类的先进文明。主要翻译希腊哲学著作，包括您刚才说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作品，也包括东方如印度、波斯等古国的哲学思想著作，这不仅丰富了阿拉伯哲学，丰富了《古兰经》的内涵，最富有创造意义的是这些译著后来回到了欧洲，促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所以，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不仅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同时还传承了人类文明，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展。这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忘记的。

姑丽娜尔·吾甫力：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些思想遗产的挖掘、梳理、研究得不是很好，特别是维吾尔族学者本身对伊斯兰思想与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结合后产生的新的一种异质文明，包括对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化、艺术化、审美化这个问题研究是缺位的。

王立胜：2010年新一轮“对口援疆”和喀什特区的成立，喀什这个古老的丝绸之路重镇不仅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而且越来越引起全球关注，喀什的国际地位和在国内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和增大。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喀什人来说，当然是一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这其中蕴藏着无限的机会。但是，事情总不会一帆风顺的，历史也把喀什推向了浪尖风口上。“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以及国外敌对势力的扰乱也会随之凸显出来。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要对喀什进行全方位的理论研究，这是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的需要，更是现实实践的需要。我们要搞清楚一些很多人迷惑不清的重大问题。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比如说《福乐智慧》，这是维吾尔文化的经典著作，相当于汉族文化之《论语》，但这部经典著作却很少有人去研究，更谈不上在维吾尔社会大众中普及了。《古兰经》这部来自阿拉伯的宗教经典却是人们每天必诵的日常功夫。我感觉到，目前在喀什的大众意识中，在普罗大众的心理积淀中，维吾尔就是伊斯兰，伊斯兰就是维吾尔。维吾尔文化似乎被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在汉族人心中也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个问题是伊斯兰教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教自由，公民信仰伊斯兰教无可厚非。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是伊斯兰教的正信，什么又是宗教的极端化。把正常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极端主义区分开，在现实中成了问题。我们不反对宗教信仰，我们反对的是宗教的极端。现在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教的问题，而是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维吾尔信众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传播宗教极端主义，但是，一般信众又无法将正常的信仰与宗教极端主义分开，往往上当受骗，当了别人的炮灰。

姑丽娜尔·吾甫力：您说得很对。现在的思想困境是：一方面，维吾尔族的思想精华没有能够得到很好挖掘，如维吾尔族特别是近千年的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历史，将伊斯兰教本地化、民族化、中国化的历史，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遗存的思想精华，都没有能够得到很好总结，维吾尔族对中华民族思想史的贡献被遮蔽。

特别是今天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新形势下，要落实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如何面对伊斯兰教，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命题。维吾尔族恰好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著作可以为中华民族提供思想参照和思想补充；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化的维吾尔族的伊斯兰信仰史没有能够得到很好地总结，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被碎片化地呈现，一些维吾尔族民众不断被宗教极端势力利用、绑架，也被需要者消费。论其原因，首先是您说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问题，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维吾尔族中真的有潜心研究《古兰经》的人，一定会出《古兰经》方面的大师。告诉民众和信徒们《古兰经》究竟是怎么说的？《古兰经》并不排斥知识，相反，它极力主张依靠自己勤劳、用知识求得幸福是最大的善。所以维吾尔族中流传着一句《圣训》中的名言“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你也要去追寻”。这对历史上维吾尔族的思想家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维吾尔族中形成了追求知识、尊重知识的传统。

但实际上，在今天，当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渗透时，我们却缺乏厚重的思想防线，即正教的、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经验记忆的思想体系，去成功地防范异端的渗透。因为我

们手中缺乏抵御借伊斯兰之名宣扬暴力恐怖等异端邪说的思想武器，所以我们不仅没有阻止，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被歪理邪说牵着鼻子走。最根本的，还在于当代维吾尔文化内部尚缺乏能带领广大信教群众坚持正信、抵御异端的思想者，带领整个维吾尔文化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引领者。伊斯兰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思想文化的结晶之一，我们有责任从学理的角度成体系地研究、需要从关学科的角度去注，这只能由一大批知识分子们潜心研究，形成正教的思想体系来引导民众。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因为缺乏这样一个群体，或者这个群体过于安于现状、缺乏忧患意识，许多解释的工作只能由政府出面。而由政府出面的一个弊端，便是很多官员并不太了解伊斯兰教及其历史，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简单的工作方式，便常常将意识形态领域里正信与异端的博弈变成行政命令与政治运动。所以，在当代思想转型中本应有的思想较量以及在较量中维吾尔族思想者的崛起，这样的现象没有出现。

王立胜：对，新疆的伊斯兰学界和宗教界确实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人物，至少那种在教众中极具影响力、同时在伊斯兰教理论上有很高造诣的大师没有出现。这本身也是宗教极端主义能够得以盛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姑丽娜尔·吾甫力：《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成，是神圣的语言，讲经读经必须用阿拉伯语，这是信教者的共识。《古兰经》只是近年来才被翻译成现代维吾尔语，这特别有利于我们的专家仔细研读。我现在不能理解的是，维吾尔族有这么多人信仰伊斯兰教，也有很多宗教人士，却没有人通过研究阿拉伯文、波斯文资料来开展辨伪的工作，来告诉信教群众，哪些是文献资料中确实存在的，哪些是道听途说被人杜撰的。可惜我们都不懂阿拉伯文，都不懂波斯文。因为无知和不求甚解，甚至有些人说“伊斯兰教和科学是对立的，要远离科学和科学文化产品。”这样的话更把现在青年人的思想搅得乱七八糟。

王立胜：据我所知，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其中科学复兴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伊斯兰经典，是通过伊斯兰文化这个中介拯救了古代希腊罗马科学。怎么能说伊斯兰教和科学是对立的呢？

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的。早期伊斯兰文化最发达的首先是哲学和科学，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就是穆斯林。他们热爱科学，崇尚知识，著书立说。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伊斯兰，剩下的更多是形式，如服饰、清真寺、各种礼拜活动和禁忌。这也使得很多内地的同志觉得维吾尔文化就是伊斯兰文化，所以在他们的想象中，西域、维吾尔族，就是异域的阿拉伯，就是《一千零一夜》或者是美酒美女，还有就是大漠孤烟、瓜果飘香。这样一来，维吾尔族历史上为追求真理而著书立说的思想家们、他们留下的丰富的科学文化思想著作以及在丝绸之路上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做的贡献，都完全被遮蔽了，一个善于思考、长于书写、乐于包容多样的维吾尔族的形象其实被扭曲了。当前，维吾尔文化受到美国文化冲击、受到土耳其文化冲击、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冲击，确实是到了关键时刻。

王立胜：维吾尔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吸取了伊斯兰文化的一些成分或者元素，这对维吾尔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从目前情况看，尤其是从南疆社会的思想状况看，维吾尔文化受到的最大冲击也正是来自伊斯兰文化。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在是伊斯兰文化不仅把维吾尔文化冲击了而且是替代了。维吾尔族成员把伊斯兰文化看成是自己的文化，好多干部也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就是穆斯林，认为维吾尔人必定是伊斯兰，必定是穆斯林。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借此推进泛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把泛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也当成是维吾尔文化。

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的。您提到的这一点很关键，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从我自己目前看到和正在翻译的一些维吾尔文史料中，可以感受到其实宗教极端势力、保守势力一直存在，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从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喀什一代代知识人，对伴随着宗教正信存在的异端邪说一直都持批判态度。这在历史上是如此，现当代也是如此，喀什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宗教保守势力的批判态度是很坚决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宗教极端是民族发展和进步的最大障碍。这些老一代知识分子们对喀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梳理，对苏非、依禅派愚弄人民的行径进行

了详实的解析。特别是有些专家提到，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要道的西域的对外交流、文化碰撞不再如之前那样频繁，影响到维吾尔社会的思想对话和交锋逐渐趋于一元化，到了叶尔羌汗国后期，曾经如火如荼的文学翻译运动、传记文学发达的时期已不复存在。苏非、依禅在这时也不再具有以往的批判、质疑的精神和用诗歌表达思想的进步性。近三百年喀什的历史，就是进步与保守、团结与分裂的历史。这正好可以找到现在维吾尔族思想为什么停滞不前的内在历史根源。我这里主要是指与之前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察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时期相比，并没有产生大的思想家和重要的著作。

王立胜：现在的维吾尔文化本质上是被伊斯兰教的外壳硬硬地包裹着，文化保守性很强，拒斥外来文化，有的甚至倒退到宗教原教旨主义。这实际上无异于扼杀维吾尔文化。

姑丽娜尔·吾甫力：您确实看到了维吾尔族文化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各民族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维吾尔族没有能更好地发扬本民族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即兼容并蓄、自我质疑、为我所用、自成一体的特点，没有能够在全人类文明的滋养下发展进步，反而走向自我封闭、缺乏自信，这与古代丝绸之路时代的维吾尔族开放、进取、包容形成明显的反差。同样是思想碰撞、文化交汇的大时代，今天我们却畏首畏尾，甚至缺乏百年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为了真理、为了社会进步勇于向保守势力抗争的精神，虽然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现象，但在维吾尔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维吾尔族文化不仅包括伊斯兰文化的一些元素，而且还包括之前的萨满教文化、佛教文化、摩尼教文化等众多元素，也包括人类四大文明的结晶。在这些文明的熏陶养育之下，维吾尔族有选择地吸收了伊斯兰教，而且使伊斯兰教民族化、地方化、艺术化，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成就，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骄傲的、也是必须要继承的。至今维吾尔文化中仍有萨满教的习俗、一些佛教的习俗。但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凡不是纯伊斯兰教的，就要被剔除。我们小时候，有些习俗就含有多种宗教的成分。如结婚时新娘被迎进男方家，有一个“跳火”的习俗，意思是要消灾避难，以求吉祥，就是萨满教习俗的遗存，很有意思。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了。还有女性见面碰脸，文革时期曾在别的地方消失了，在喀什还有保存。但是现在我在喀什好像听说一些持异端者视为不洁，女性之间不能碰脸，以此来蛊惑群众。但是现在的事实是，象征着友善温情的喀什的这一风俗不仅保留着，而且成为维吾尔族标志性的礼仪。也就是说，符合民众社会生活和交往需求的民俗活动，是富有生命力的。

王立胜：碰脸习俗在喀什延续下来了。

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的。一度只有在喀什保留，现在各地都这么做。其实仔细想想，维吾尔族的很多风俗，都在喀什保存得较好，之后逐渐蔓延到其他地区。但是现在民间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好像维吾尔族的文化全部都要放在伊斯兰教的框架里面去衡量，符合伊斯兰教的，就应该存在，或者说符合现在所谓的“纯伊斯兰教的”才能被允许存在。不符合伊斯兰教的就不能存在。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也是“喀什噶尔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需要正本清源的重要内容。

王立胜：谈起“喀什噶尔学”的建构问题，确实应该引起学界和政界的高度重视。建构“喀什噶尔学”十分必要也具有切实可行性。喀什噶尔作为一个地域学概念，就其研究对象来说，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既具有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独特性，也具有不同于新疆其他地区的独特性，应该作为一个特殊对象进行系统研究。地域作为独特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学”“澳门学”等，它们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是因为它们作为地域的特殊性。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很多地区也纷纷将自己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进行学术研究，比如，我就曾经看到过一本书《成都学概论》，该著作也极力探讨成都的特殊性问题。喀什噶尔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域，虽然不同于香港和澳门，但作为中国西部开放的重要门户，作为在新世纪成立的一个新的特区，作为自古以来的丝绸之路古城，其历史的独特性和现实的独特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纷纷来喀什噶尔并进行学术研究和探险旅游，写出

了大量的有关喀什噶尔的著作，喀什噶尔在西方国家和中东国家影响巨大。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关于喀什噶尔的研究著作却十分罕见，尤其是现代学者的著作更是难以见到。因此，今天我们提出“喀什噶尔学”研究，其实具有补课的性质。“喀什噶尔学”应该是属于中国边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喀什噶尔学”的建构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切实可行性。很多古今中外研究喀什噶尔的著作和文章为“喀什噶尔学”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特别是现代研究工具的发达为我们搜集资料提供了方便。国内外的各种学科的研究专家准备了队伍保障，尤其是4个援疆省市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可以为我们建构“喀什噶尔学”和进行喀什噶尔研究提供强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动员很多的资源包括经费投入这项研究。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这项工作的具体运作，吸引大量维吾尔族青年学者参与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培养一批立足喀什和新疆、具有世界眼光和中国视野、知识全面兼备的维吾尔思想家和喀什思想家。

“喀什噶尔学”的研究要把研究维吾尔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为重要课题，要搞清楚什么是维吾尔文化？何谓伊斯兰文化？要在弄清楚维吾尔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要研究维吾尔文化怎样与世界现代文化接轨？如果说传统文化一定要现代化，那么，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汉族文化会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马戎教授有篇文章写得好，他针对有些人所认为的“学汉语就是被汉化”的错误认识，提出了维吾尔文化是在被汉化还是在进行现代化的问题？其实呢，现在纯粹的汉族文化已经不存在，所谓的汉族文化早已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转变了。只不过我们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汉语，汉语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化知识体系的语言载体，当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化传入中国时，它首先转化成汉语来表达而已。所以，对维吾尔族青少年来说，目前的汉语学习不是汉化的过程，而是现代化的过程。

现在要讲清楚的是维吾尔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比如说文艺的现代化问题，经济的现代化问题，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您是搞文艺理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应该当仁不让，我相信您是愿意承担这个重大责任的。我们来看一下蒙古族，他们把蒙古文化现代化了，就说他们的歌曲，这些年推出了许多影响全国的曲目，比如《呼伦贝尔大草原》《陪你一起看草原》《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有很多首歌，各民族都在唱。还推出了很多著名的歌唱家，比如腾格尔、乌兰托娅、格格等。还有就是藏族，他们的民歌也在现代化，他们的著名歌唱家也很多，降央卓玛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中音。再看看我们新疆，我们的文化资源应该不比西藏和内蒙古差，我们的民歌也不会比他们少，但是，这些年我们确实在这方面不如西藏和内蒙古做得好。我们新疆的歌曲没有推出去，我们的歌唱家也没有培养出几个来。这都是值得反思的一些问题。其实质就是，我们文化现代化的思路和路径成了问题。

姑丽娜尔·吾甫力：我们的歌手在内地有较大影响力的确实不多。

王立胜：新疆的歌手走不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语言上的障碍。其实，这些年我们也创作了一些新的歌曲，但只是局限于用维吾尔语来表达，不能够翻译成汉语。在这方面我们就不如藏族歌曲或者蒙古族歌曲。比如藏族歌曲，用藏语唱一段，用汉语唱一段。采用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少数民族和汉族人都听得懂。二是文化要想走出去，就要创作出能够走出去的作品。我们维吾尔族的文化工作者中确实有些人有保守主义的倾向。我就听到有的词曲作者说过，我们的这些旋律不能改变，不能用现代的形式来表达，否则就不是我们维吾尔族的东西了。这种态度就表示对艺术形式的现代化都不愿意接受。现代青年喜欢的艺术形式我们必须适应，那种快节奏和铿锵有力的旋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走出去，才能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和其他民族地区传播维吾尔文化。三是要在艺术形式上不断创新。我们知道，歌和舞是维吾尔族民族文化的基本艺术形式，但绝对不能局限于这两种基本的形式，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利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这一些都牵扯到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维吾尔文化要想发扬光大，就必须走出去，要让人家能够听懂看懂。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这里的走

出去，不仅指走出国门，其实走向内地也很重要，也是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姑丽娜尔·吾甫力：用大家共同的语言说话。我们的歌手、艺术家过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但又没能很好地彰显它。

王立胜：世界在走向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形成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力量对喀什的作用和影响。新疆和喀什都是中国这个整体地域的一个部分，都是全球的一部分，它一定不能脱离这种整体的规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特殊性，但不能固守我们的特殊性，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特殊性来提高我们的影响力。尤其是文化上的特殊性，文化的差异性正是市场的潜力所在。不能只顾自己的特殊性，忽视了这种特殊性中所具有的一般性力量。

姑丽娜尔·吾甫力：自我封闭的结果是最后无法与其他文化交流对话，只能自言自语，自得其乐。

王立胜：这就牵扯到文化的产业化问题了。我们要考虑喀什的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文化资本，如何利用这些文化资本来形成我们独特的文化产业。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既使我们的文化能够走出去与全国接轨、与世界接轨，又使我们的喀什文化走向现代化，最后为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喀什地域文化找到一个有效途径。

姑丽娜尔·吾甫力：我可能还要接着上一个问题说几句，再谈谈维吾尔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其实我觉得维吾尔文化的现代化早就开始了，只是我们当代的维吾尔族学者缺乏理论上的自觉，中间出现了断裂。我在学习、整理上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的一些维吾尔文献资料时也感觉到，在当年宗教极端思想泛滥、阻碍维吾尔文化发展时，那时就是民众和一批进步的宗教知识分子自发地组织起来，与封建保守势力进行了思想斗争。许多进步的宗教学者，他们从国外学习回来，一些人甚至接触过俄国十月革命，他们回来以后，自发自费建立新式学校，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他们提出宗教改革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自发在喀什成立了一个清真寺-经学院改革委员会，推广科学、文化、民主。但是不到一年，一些宗教上层人士觉得妨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最后这个改革就被扼杀了，还有很多人甚至被杀害。

有一位可以称得上是 20 世纪初维吾尔族思想文化启蒙先驱的人物，在维吾尔族中影响很大。他在国外学习很多年，甚至在阿拉伯世界游历、在著名的清真寺讲学，看到世界的发展变化，认识到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回到喀什后，他推进宗教改革，在经学院讲授经文的同时，增加了科学文化的课程，如天文、地理、数学、体育课等，甚至当时一些新式学校里面还有游泳池、澡堂，甚至一些地方还有女子学校。也就是说，当时喀什的现代化步伐一直没有停止，是在民众的推动下，结合知识界的进步力量，共同开拓了喀什的现代化之路。

其中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喀什的一些重要的商业街巷的出现。如“安集延街”就是喀什现代化的标志，位置就在艾提尕尔清真寺旁，主要是与前苏联的商业贸易，出售的商品包括生活用品到服装、百货等等。当时前苏联的生活方式及习惯对整个新疆、对喀什的影响是很大的。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安集延街”在喀什古城的维吾尔民众的口头话语中还保留着。但是现在形成的一个怪圈是，高校不同学科的专家们对宗教文化的事不怎么感兴趣，或者说不屑于贴近民间，不屑于研究这些不属于他们各自学科的民间的活态的历史；宗教人士又不具备科学素养。这与以往的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我们现在的专家不出校门，在教科书与职称中忙碌，并不关心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而我们的宗教领域有的只是宗教人士，却没有宗教大师。一部与中国内地同步发展的、鲜活的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进程、近代思想发展历程、城市发展历程就这样在我们手中无人问津，默默低语。

宗教文化是人类深邃丰厚的思想文化的重要部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大师同时也是宗教大师，他们把人类的知识和文化融会贯通，赋予宗教文化以鲜活的生命力。我自己比较困惑的是，国家对宗教事务十分重视，也倾注了大量物力财力，那么我们的经学院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具有影

响力的宗教思想大师，用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思想来影响周边国家，让中国的宗教文化之花、维吾尔文化之花在中亚、西亚、南亚开放？这不是没有先例可借鉴。作为古代的两个地方政权，喀喇汗王朝和察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思想文化曾经在中亚、西亚具有较大的影响，对周边区域具有影响和辐射力，当时许多人从波斯、印度、撒马尔罕来到喀什噶尔学习和交流，据说波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萨迪就来过喀什噶尔。

我们说抵御境外分裂势力渗透，强大的思想文化其实才是强有力的抵御武器。因为我们在思想上不够强大，不够自信，一些人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属，才会皈依于一个自己都不了解的异端邪说，被极端思想牵着鼻子走。所以，在新疆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强大的思想来稳住人心、凝聚人心。但这不能靠政府文件或者行政命令，这需要真正的文化实力，思想定力。

王立胜：您的这种看法深邃且符合实际。就中国范围来看，现在您看佛教界的大师不少，这些大师不仅在佛教理论上有很多时代创新，使佛教理论不至于落后时代，而且他们在佛教界甚至在社会上都很有影响，这是达到宗教与社会和谐的正能量。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伊斯兰教的大师很少，尤其是新疆的伊斯兰教大师级的人物好像很少。新疆的伊斯兰教不仅与海外的伊斯兰教不一样，与内地回族的伊斯兰教恐怕也不一样。这不仅关系到伊斯兰教的理论创新问题，还牵扯到伊斯兰教的本土化问题。这就是您所说的“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我们倡导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是我们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宗教要想与此相适应，自然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有所发展和创新。从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方面看，也应该不断有伊斯兰教大师级的人物出现。没有对民众极具影响力的宗教大师，这恐怕也是我们的教众很容易受到那些与正信不沾边的所谓伊斯兰教教义冲击的一个理论方面的重要原因。所谓正信挤压，必须使广大教民知道何谓正信，这种正信的灌输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宗教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伊斯兰教界和新疆理论界还要做很大努力。当然了，伊斯兰教在理论上缺少创新自然有理论层面本身的原因，同样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恐怕还有利益方面的影响，一些宗教人士的利益固化，不想自己现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之所以不想改革，不想往前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影响自身现有的利益。

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的，在新疆的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文化转型发展进程中，作为思想文化的一部分的宗教思想文化也要与时俱进。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宗教问题，宗教在新疆似乎是一个禁区，不能碰。我觉得让宗教来背这个罪名不应该，改革和宗教没有任何对立关系。我们改革的应当是人的观念，我指的是当代人们理解和对待宗教的态度需要变革，我们今天应当怎么理解宗教和宗教文化，才是一个关键、核心问题。如果从既得利益者的立场来考虑，确实碰不得。但从维吾尔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宗教文化是维吾尔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维吾尔文化的发展进步必定要推动宗教文化的发展，这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欧洲文艺复兴首先解放了人的思想，冲破了束缚人们精神的狭隘、落后的宗教观，这才开启了欧洲科技的大发展，逐步确立了欧洲政治、思想、文化的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欧洲人并没有因此失去宗教，宗教文化甚至成为凝聚人心的重要精神力量。

王立胜：这就又回到了维吾尔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一定要提到弘扬维吾尔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就像您所说的，宗教文化或者说伊斯兰文化在维吾尔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或者说维吾尔文化在发展中吸收了伊斯兰文化的精华元素。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上维吾尔文化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一定是一个弘扬科学精神的文化系统。我们现在要弘扬维吾尔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为伊斯兰文化中的保守因素所制约，特别是不能为原教旨主义所羁绊。弘扬维吾尔文化就应该好好研究《福乐智慧》，《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文化形成的主要标志。但是现在对《福乐智慧》的研究是薄弱的，不仅对《福乐智慧》本身的理论研究，就是其知识内容在维吾尔民众之中的传播也是很

不够的。广大维吾尔民众知道真主，知道《古兰经》，可是有多少人知道《福乐智慧》？有多少人知道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这位伟大的维吾尔思想家？许多人对这些都知之甚少，就更谈不上展开《福乐智慧》与其他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了。

现在看到的唯一的一本书就是热依汗·卡德尔的《南宋儒学与〈福乐智慧〉的比较研究》。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维吾尔族的研究员。这本书做的是南宋儒学与《福乐智慧》的比较研究，将维吾尔文化的这部经典著作置放于中国南宋文化的语境中进行对比研究，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深化维吾尔文化研究和维吾尔文化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热依汗·卡德尔的研究没有终止，后来我又看到她的一篇文章将庄子与《福乐智慧》做了比较研究。《福乐智慧》是对维吾尔文化集大成式的总结，她总结了维吾尔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思想精华，虽然它是一首长诗，但其本质上是一部思想著作，谈的是治国理政的智慧和人生的智慧。对这部著作的研究应该成为维吾尔文化研究的一种典型范式，它是维吾尔文化的发源地和思想基础。这部著作好像形成于公元10世纪吧？

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的。10世纪伊斯兰教才刚刚进入新疆，还没有完全占统治地位，当时的思想文化十分多元。喀喇汗王朝推行的政策是多元并存，所以当时清真寺和佛教寺庙并存，当然也有儒家文化和老庄思想的影响痕迹。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处于上升时期，包括思想文化上也具有积极进取精神。关于这个问题，日本研究者羽田亨的专著《西域文明史概论》，对我们认识今天的维吾尔文化有一定的作用。喀什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四大文明的交汇地，在起到重要的文化桥梁作用的同时，也受益于多种文明的养育。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海路的方便快捷使得之后的文化交流重心很快移位，西域逐渐失去了与更多文化进行交流的机会，失去了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逐渐走向自我封闭。在此之前，维吾尔文化是一个很开放、很兼容并蓄的文化。维吾尔文化的特点就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同时又能自成体系。

王立胜：也就是说，维吾尔文化今天所具有的封闭性并不是其本质形态，在其历史的初期并不是样子的。维吾尔文化本身就是多种文化融合形成的产物，就是维吾尔民族自身也是多个族群融合而成。那么，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维吾尔文化的保守性是历史形成的。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维吾尔文化为什么会走向保守呢？其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又是什么呢？这种保守的状况怎么样才能得到改变呢？

姑丽娜尔·吾甫力：喀什特殊的地理位置应该是维吾尔族特色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陆上丝路文明辉煌时代之后，我们一度失去了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机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党中央和国家对喀什的战略定位，是把喀什建成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都市、西部明珠，这为喀什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说一千年前由于人类文明交流、商业贸易的需要，喀什在独特的地理位置上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为人类文明的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提升了自己；今天，党和国家的战略再一次把这样特殊的机遇给了我们。所以喀什各族人民一定要抢抓机遇，再留下一段有关丝绸之路的佳话，留给世界、留给后人。

王立胜：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和所具备的条件说明，现在研究“喀什噶尔学”正当其时。我觉得“喀什噶尔学”除了研究我们以上所说的维吾尔文化外，还应该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喀什噶尔是个地域学的概念，也是一个边疆学的概念。从历史角度说，喀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枢纽和重要节点，那么，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就应该纳入“喀什噶尔学”的研究。丝绸之路意义上的喀什噶尔研究之所以重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喀什处于丝绸之路的中间路段，处于国内段的末端，这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

二是喀什噶尔是古丝绸之路中线和南线的汇聚之处，具有很明显的交通枢纽的位置，这在文化的交流中以及城市的形成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又意味着什么？

三是喀什噶尔既是古丝绸之路在国内段的终点，又是向西或者说向国外出发的起点，同时也意味着从国外向国内出发的起点，具有东西双向起点的作用，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讲的古丝绸之路，如果我们把喀什放到今天的中国战略中去思考，喀什的现代化问题自然成为“喀什噶尔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喀什每年一度的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并开始举办“丝绸之路文化论坛”，而且定位为国际论坛，就是回应了国家对喀什的这样一种定位。通过这样一些大型国际性的活动，是否可以把维吾尔文化的现代性、开放性捡回来呢？理解喀什的现代化，不能采取线性思维的方式，喀什历来是一个复杂性社会。如果说内地的现代化历程，重点是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的话——当然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证明，现代化的进程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演进路径——喀什的现代化至少又增加了三个关系：一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二是宗教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三是边疆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加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这四个关系立体地组合在一起，作为实践过程的喀什现代化进程就比较复杂了。相比较而言，如果内地的传统与现代的转换是线性的，那么新疆的这种转换则是立体的。这种复杂性和系统性，作为新疆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应该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但是，我们的实践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姑丽娜尔·吾甫力：您对喀什的定位很准确。另外，您说的要理清四个关系，恰好就是现在新疆发展中面临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喀什噶尔学”研究，理清这四个问题，将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进步。所以，这是关键，而不仅仅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视的服饰问题。服饰尽管与人的内在本质有一定关系，但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也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装在宗教极端势力的大筐子里。当一个人找不到民族文化之根，思想迷茫，找不到归属的时候，就会被社会上的习惯势力推着走。这其实与刚才您说的没有文化自信有很大关系。这样的服饰打扮也提醒我们真的到了需要认真思考我们的文化归属问题的时候。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维吾尔文化有一套包括伊斯兰文化在内的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体系，需要整理、筛选和继承。虽然10世纪以后伊斯兰文化对维吾尔文化影响特别大，但伊斯兰文化毕竟不是维吾尔文化的全部，维吾尔文化还包括在漠北时期在摩尼教影响之下的回鹘汗国的文化，在西迁入西域时本地原有佛教文化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文化，另外还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世界多元文化成分的影响，还不能忽略的是绿洲城市文化。绿洲就像一座熔炉，所有的文化，都在绿洲的熔炼下，相互融合，变成一个新的文化样式，与绿洲紧密相连。所以，喀什近一千年的绿洲城市文明，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也是国际上保存最好的绿洲城市文化样态之一。

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以后的维吾尔文化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但是绿洲文明所熔炼的多种文明的融合，却使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个性鲜明、兼收并蓄、自成体系。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我们在一些老照片上看到维吾尔族女性穿着花裙、戴着花帽或者在头上扎着鲜艳的头巾，展现了特有的女性柔美和特色。那是一个文化自觉、自信的符号。所以，我们还是要张扬积极进步的维吾尔文化，让维吾尔民众对民族文化感到自信，为中华文化感到自豪。有了这样的自觉，就会选择相应的服饰。所以，花帽、花头巾、艾德莱斯裙等，是真正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这些服饰的出现与维吾尔族长期生活的地域、自然风貌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石榴花帽、巴旦木花帽等，就是一个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植物果实的图案，象征着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丰收的喜悦，是健康的服饰，一定要区别对待

王立胜：我觉得首先要理清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关系，还要划清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主义的界限。

姑丽娜尔·吾甫力：您说得很对。但我还是想说，如果把一切问题都归总到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那么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就会被遮蔽。最重要的还是刚才您说的，对维吾尔族优秀传统文化要弘扬保护，让民众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同时，对当前出现的思想异端，更要能说明其危害，让民众有充分的思想自觉，使他们能在充分自信自觉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能够进行主动筛选，对思想异端能够自我防御。如果群众脑中空空，他们用什么去鉴别？用什么去抵御呢？而这种自觉首先要来自于对自己所在文化的充分自信。比如，维吾尔族吃饭时比较讲究餐具，有一种专门盛抓饭时用的大盘子，出现了很多品牌，有一种品牌，据卖家说是土耳其的品牌、土耳其生产的，

但实际都是中国生产的。这是因为目前维吾尔社会中土耳其文化流行，都要买土耳其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用的餐具、穿的服装、吃的巧克力、口香糖，几乎都选用土耳其产的。而且这种时尚在城市居民中很流行，特别在工薪阶层、知识分子群体中。维吾尔社会目前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处于需要再反思的时期。过于追求形式、追求时尚奢华，特别是城市女性在这一方面表现尤为明显，脱离社会，不关心国家民族甚至自己下一代的未来，只沉溺于个人享乐攀比，精神空虚。这些与社会上出现的腐败、社会治理能力欠缺等问题一起，都会对下一代的世界观、价值观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思，或者一味指责政府不关心，或者把责任推到极端宗教势力上，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王立胜：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

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的。所以就是刚才说的，宗教极端势力确实存在，但是我们把所有问题都推到宗教极端势力一方也是不负责任的，那只能更加说明我们的不自信。我认为近百年来，维吾尔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基本上是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展开的。维吾尔族的思想文化深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也受到近现代伊斯兰文化革新运动的影响。这三条线一直在影响近代的维吾尔文化，也是20世纪以来维吾尔文化进步发展的潜在动力。只是我们没有整理、更没有把20世纪以来的维吾尔族思想文化的发展放到一个更宽广的背景来认识，也就是在中国、在世界的格局中认识维吾尔族文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维吾尔文化现代化已经在路上，喀什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知识分子”这个专有名词（Ziyali）的出现和喀什城市群的出现，就是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标志性象征，只是我们没有关注到而已。20世纪初一些维吾尔族启蒙思想家的诗歌，本来是号召人民摆脱封建愚昧、追求科学文化思想的，也被现在的一些人解释为号召民族独立，用来进行片面甚至歪曲的宣传。

王立胜：我们维吾尔族的一些诗歌，追求的也是现代化，追求的是科学和民主，但是现在却被一些人曲解成追求民族独立和新疆独立了。

姑丽娜尔·吾甫力：您说的很对，这是阐释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被封建保守势力杀害，说明一个民族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总会遇到挫折甚至会有人因此献出生命。维吾尔族也是如此。所以不能把维吾尔族的文化历史无限拔高，似乎是完全辉煌，硕果累累。如果整理南疆维吾尔族的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形成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在骨子里就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你争我斗，亲兄弟自相残杀，百姓横遭涂炭，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义，给维吾尔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维吾尔文化的发展造成了障碍。如果用一些维吾尔族老学者的话说，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出现，埋下了维吾尔族内部不团结的种子。我们应该认真梳理那些追求进步的人士所做的贡献。我们自己要自觉地认识到一些问题。

王立胜：喀什的全面研究，既要研究历史又要研究现实，但是这些研究必须要有理论研究做支撑，所以，喀什研究在理论层面的提高就显得非常重要。按照您刚才的回顾性的总结，我们知道，维吾尔文化一直走在现代化的路上，维吾尔文化并不排斥现代化，也是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的。从历史过程来看，维吾尔文化对现代化的追求有三条线索：一是西方世界的伊斯兰革命；二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三是中国革命。另外刚才还谈了一个问题，分裂主义在思想上的源头是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斗争，实际上是政教合一导致的结果，利用宗教来进行的政权争斗、权力争斗。莎车一个作家写的《魔鬼夫人》，就讲述了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图景，描述了当权者是怎样利用宗教来为自己争权夺利和愚弄人民的。看过这部书的人都说写得特别好，对维吾尔青年有教育意义。《魔鬼夫人》用小说的形式复原了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让民众比较直观地看到封建保守势力愚弄人民留下的祸根至今难以消除。这种叙述方法所表现的历史事实，也呈现了一种社会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历史线索。这个线索如果梳理清楚的话，也是比较好的一种历史教育方式。

您所说的三个方面的革命线索和《魔鬼夫人》提供的线索，都是历史自觉的表现。在喀什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缺少历史的自觉，一方面缺少理论的自觉。一个国家要不断地进行历史研究，

以达到历史自觉；同时，也要不断进行理论反思以达到理论自觉。一个地区也是一样，要不断地回顾和反思历史，进行历史自觉，也要不断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理论自觉。“喀什噶尔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完成这样两个方面的自觉。在这两个自觉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觉，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理论前提，历史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历史基础。通过这种文化自觉，才能实现文化创新，才能为我们这个地域的发展提供文化力量，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显示一个地域的文化软实力。

我们的目的就是在现代文化的引领下，以地方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底蕴为基础，以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问题，以整体中国的眼光来思考问题，在认真梳理地域历史文化发展的前提下，立足于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充分发挥本地域干部群众的主体力量，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奋力开拓，不断整合和创新地域文化，从而形成这个地域的新文化，塑造地域群众的新生活。这样一个思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方向，又不脱离地域文化基础；既继承了地域文化的积极的、精华的成分，坚持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又剔除了地域文化的消极的、糟粕的成分，坚持了文化发展的科学态度，从而实现了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一个地域文化的软实力不仅在于它所显示的对于本地域人群的凝聚力，更在于它对其它地域或者外地人群的影响力。这种凝聚力和影响力的产生、发展机制在于它创新力的高低。我们的文化资源是个丰富的宝藏，具有极大的挖掘潜力。

姑丽娜尔·吾甫力：维吾尔族有一首儿歌叫《娃哈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唱遍大江南北：“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大地，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当下，很多内地歌手用不同的方式演绎这首歌，但是我们自己却不去唱了。在维吾尔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这只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已。如果不注重挖掘和保护文化资源，发展就是无源之水，必将不会长久。

王立胜：《娃哈哈》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教育意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转化为巨大的商业价值，它成了商业产品的一种形象，一种代言，一种文化符号，给企业带来了不可预期的利润。很可惜这个品牌的商业运作不是我们新疆的企业。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歌曲也是我们维吾尔民歌，《娃哈哈》的商业发展史有我们的贡献。我们可以以此为参照，不断发现和挖掘我们的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挖掘的过程就是现代文化引领的过程，就是文化现代化的过程。

我们的文艺作品要真正地反映我们新疆的现代生活，特别是维吾尔农村和城市的现实的日常生活，当然这种文艺作品的创作不是机械的摹写，而是赋予了核心价值观的艺术创作，只有这种作品才能引导年轻人沿着正确道路走向自己辉煌的人生。文艺作品的感染力是很强的，尤其是对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成长时期的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但是遗憾的是，目前这种有震撼力的文艺作品实在是太少了。我到农村的文化站和文化室看过，文化站室因为国家的重视，硬件都建得很好，设备配备也很到位，但是对群众的吸引力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内容的陈旧、内容与农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离得太远恐怕是根本原因。我们不能提供群众真正需要的作品，这是关键问题。

姑丽娜尔·吾甫力：苏联十月革命后，一个维吾尔农民非常崇拜列宁，他想亲眼看看十月革命，自己自费去了苏联。回来编写了很多民歌民谣，宣传苏联十月革命。这个人后来因为追求公平、仗义执言而被杀害。这个人就是喀什人，在群众中家喻户晓。这样的民间人物如果我们加上现代的元素，赋予中国梦，群众可能愿意接受并从中受到启迪。我再讲一个人：你们去香妃墓，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墓，主人叫苏黛香，是位汉族女性，她是清政府赐给香妃哥哥的，奖励他守土有功。而这位女性性情温婉，具有中华民族女性传统的美德，后来不仅信奉了伊斯兰教，与当地群众和睦相处，而且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在喀什，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包容了她，人们给她取了维吾尔族的名字，并对她表示了极大的尊重。这些事实就充分说明，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文化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

王立胜：我现在觉得“喀什噶尔学”的研究应该从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等方面进

行全方位的研究，这种研究也许能够为我们维吾尔族的艺术创作奠定理论基础、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否则，可能文艺创作也就失去了根基，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它的社会功能。

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的。喀什的历史文化积淀很深，古老的记忆留存随处可见。但是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来表现，还要与现代各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要相互交流和结合起来，共同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我们今天的时代、民众的欣赏视野。但是现在很多传统元素却没能很好地与现代技术结合，没能与当代受众的欣赏情趣相结合。所以，在艺术创作中，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还不是太多。

王立胜：民族地区的歌曲不仅要表现民族地区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联系起来，西藏的歌曲唱的都是西藏和北京的联系。过去的歌曲是这样，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等等，新的歌曲也是这样，比如《天路》、《青藏高原》等等。

姑丽娜尔·吾甫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疆出现了一大批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新时代的脍炙人口的好歌，至今都在被传唱。那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迎接翻身解放、思想共鸣的时代。当时的维吾尔族民歌《解放的时代》就很优秀，群众很喜欢，至今流传。我母亲曾经教给我一首民歌，名叫《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曲调非常好听，也是一首经典老歌。歌词大意是：“把蓝天都变成纸；把长江大河都变成墨，把所有的森林都化成神笔，让天下劳动人民都成为诗人，歌颂您啊，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的颂歌千万首，您的恩情唱不完。”这是维吾尔族情感的主流，至今没变。每每唱起来，都能在广大维吾尔民众中激起情感的浪花。您说的再唱经典，对这个主题的阐发是很有意义的。

王立胜：在鼓励新创作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包装一些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经典歌曲，这些歌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们都是在原有民歌曲调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新发展改编而成，既有那个时代的时代感，又基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唱出了群众的真实感情，所以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有没有我们维吾尔族的戏剧啊、小品啊等地方剧种什么的？这些艺术形式都可以用来表达现代生活。采用民族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的生活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文艺工作方针。当然了，艺术形式也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予以改革，比如十二木卡姆，这是我们维吾尔族文化园地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我们维吾尔族对人类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我们要保护这种艺术形式，但是，我们也可以适应现代的生活节奏予以再创作。赛福鼎就提倡用交响乐的现代乐器来演奏木卡姆，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姑丽娜尔·吾甫力：现在一些很现代的小品之类都是用母语在表现，维吾尔族很喜欢，也很有特色，但不易于推广。新疆有一位喀什籍的小品艺术家，表演特别好，群众特别喜欢，而且在能笑声中批判一些社会问题，甚至大胆揭露维吾尔族的一些劣根性。这是维吾尔族中的思想自觉者，他们能够认识到本民族在当代社会中存在哪些问题，而且勇于直面，大胆揭露，但是很可惜，因为语言的问题，这些先锋思想不能被其他民族所了解。现在提“喀什噶尔学”，我感觉恰逢其时，“喀什噶尔学”的研究成果、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对整个新疆思想文化的推动会起到重大作用。

王立胜：这种小品艺人的艺术才能仅仅表现于维吾尔群体内部，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们应该广泛发掘这方面的人才，在财力物力方面予以支持，把这些作品翻译成汉语甚至英语等语言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予以展示，一方面展示我们维吾尔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维吾尔文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宣传了新疆，宣传了喀什。通过这种活动增进与外界的文化和民族交融。我们现在关键是缺少各方面的专家，特别是维吾尔民族专家。民族专家不仅仅要懂国家通用语言，还要懂民族的发展史、民族文化史，具有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学创造的能力。根据我们的历史文化创作的文艺作品，可以通过现在的一些媒体平台推广出去。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等节目就是很好的平台，这个平台推出了多少人才啊。有些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民群

众，一下子就成了全国的名人。既宣传了个人，又对其出生地产生推广效应。说实在话，他们的艺术才能和我们维吾尔族的一些艺术人才相比的话，我们的很多人并不逊色。问题在于我们的观念和各方面的工作不到位。其实，这种参与十分重要，这既是推出人才的一种机制，又是地域文化宣传的一种机制。总之一句话，就是培养人才特别重要。在“喀什噶尔学”的建构中，我们应该把培养一批有志青年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姑丽娜尔·吾甫力：国家、教育部给喀什大学的职责定位，就是要把喀什大学建成培养现代人才的基地。但是很多老师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所以还没有更大的决心和动力走出校园、关注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王立胜：有一个著名学者叫叶嘉莹，现在 80 多岁，其古诗词讲得非常好，我非常佩服她的精神。我给您提个建议，您是维吾尔族的著名学者，您不仅要讲，还要写。还要把培养人才作为大事情来抓。您比叶嘉莹年轻多了，从现在开始干的话，会干成很多事情。我觉得带队伍非常重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其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需要有人来干，如果没有人来干，那就是一句空话。

姑丽娜尔·吾甫力：谢谢您的鼓励！

王立胜：喀什的文化建设还没有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和联系搞清楚。对文化事业是重视的，虽然现在只是初步的，但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没有起步。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在认识这个层面上。有些人认为，新疆与内地不一样，文化事业都搞不好，怎么能够提发展文化产业呢？发展文化产业在新疆尤其是在喀什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其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化事业为文化产业确定方向和奠定基础，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文化事业的巩固和继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当然，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尤其是资金的支持和政策的支持。在资金方面如果能够拿出搞稳定工作的十分之一的钱就足够了。在喀什，文化产业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先导产业来做，因为文化资源这么丰富，这么具有个性特点，文化资源的差异性形成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样才能使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也就是怎么样使我们的文化资源进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体系。只有进入了全国和全球的市场体系，资源才能转化成资本，才能使这种资源转化成产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目标上有明确的要求，文化产业在 GDP 的组成中要达到百分之五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喀什达到 1000 个亿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必须有 50 亿元的文化产业。再一个就是文化产业拉动本地的就业。就业问题是喀什最突出的问题。尤其是促进就业岗位的增长问题，产业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没有产业的发展怎么会有就业岗位的形成呢？但是，从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和拉动就业的产业来全面分析，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是比较现实的产业发展选择。

姑丽娜尔·吾甫力：文化产业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内容，确实没有发言权。我也接触过一些内地的专家，他们大多都到新疆来做过文化产业规划，但他们自己都说，其实他们对当地现状并不了解，完全拿着他们自己在内地的模式去做规划。而我们目前在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中又过于依赖内地专家。这样起步的文化产业，势必与本地社会现实脱节，比如南疆的一些地方，出现了跟风攀比或者无序竞争，不利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资源的合理使用。所以我想我自己去做一做，最重要的是能带动一批有志于此的当地各民族青年。为此我申请了一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到北京学习了几个月，也认识了一些专家。但文化产业需要有政策支持，并要能够形成本土人才团队，把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这应该是喀什未来发展最有优势之路。

王立胜：其实喀什大学也应该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甚至很有必要成立一个文化产业研究所，有针对性地对新疆的文化产业问题尤其是喀什的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做深度研究。当然了，高等院校研究现实问题有个局限性，就是如果研究人员迈不出校门，那就与社会现实隔着一层。但是，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这种研究，这是最大的推动力量，高等院校自觉适应这种需求，至关重要。

据我所知，山东一些高等院校有很多类似的研究所，他们与地方党委和政府合作得很好，形成了一些这方面的合作机制，这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学习的经验。我们如果有了这种建构，既可以学习他们的经验，又可以与他们合作。这样，把他们的先进理念和工作方法与我们对本地相对熟悉的优势相结合，做出的成果既高屋建瓴又接地气。同时，与他们合作的过程也是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他们的带动作用更是我们所渴求的。喀什必须有自己的产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发展什么产业？发展产业的时序怎么安排？这需要认真研究和科学安排。有些人反对喀什发展工业，这是非常近视的眼光和保守的观念，我们必须抓工业。但是，抓工业不会立竿见影，尤其是对地方税收的贡献要有一个很长的发育过程，现代工业对就业的拉动也不会是很大的。文化产业包括旅游业就不一样了，它不仅不需要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产业链条的形成和基础设施的配套，而且不需要到外地去开拓产品的销售市场。最重要的是它对拉动农民富裕是最直接的，对促进就业是最有效的。只要有了文化产业项目，我们好多小伙子小姑娘跳跳舞唱唱歌就来钱了。这里的关键是转变观念，目前连歌舞团的小姑娘唱歌跳舞都不能露出胳膊和腿，这些观念要改变。

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的。我也知道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他们都有一批专家也非常希望到喀什合作，也特别想了解这边的情况。但是现在喀什没有这样一个平台，没有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和团队，需要搞文化产业项目时只能依靠内地专家做规划，他们做完规划以后，留在这里实施的当地人与内地规划者的理念之间存在差距，本地人要将规划具体实施并加以本地化也需要一定的能力，其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王立胜：“喀什噶尔学”要研究文化产业问题，并且把文化产业规划作为一个重要课题。

姑丽娜尔·吾甫力：喀什的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丰富，但目前的现状就像是抱着金饭碗却到处讨饭吃。建设“喀什噶尔学”这个项目开始运作了吗？

王立胜：已经全面启动。我也想跟您商量，征求您的意见。我们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专家也作了对接。总体思路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因为仅靠喀什和疆内的专家是解决不了问题和满足不了需求的。自治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4大援疆省份的力量都要动员起来。现在初步打算成立一个机构——“喀什噶尔学研究院”，一个学会——“喀什噶尔学研究会”，创办一个期刊——《喀什噶尔学研究》。研究院是一个政府机构；研究会是个民间组织；期刊是这个机构和组织的阵地。通过这些平台建设，把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喀什噶尔学”的建构不是为了写几本书和写多少篇文章，最重要的是研究喀什的历史发展、喀什的经济社会发展、喀什的文化、喀什的社会问题，是以问题为导向，实施多学科、多领域全面合作。主要目的是为新疆特别是喀什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服务。

姑丽娜尔·吾甫力：“喀什噶尔学”应该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培养本地的人才队伍。让“喀什噶尔学”成为一个平台，凝聚各方智慧，让喀什噶尔学成为一座桥梁，连接内地与新疆的资源和信息。

王立胜：当然，这是根本，但是，目前仅靠本地力量不可能办到。我们必须借助外力，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在工作的过程中，实现向主要依靠内力的转变。“喀什噶尔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现实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而且应该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建构，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所以，必须要突破学科的束缚，树立问题意识，才能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

姑丽娜尔·吾甫力：“喀什噶尔学”研究是一个全方位的，目标是能够为国家、为喀什的思想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撑。这是喀什的软肋和短板。这是靠外力援助不能替代的，必须要有本地的经验，本地的人才，成为喀什思想文化发展的引领，这是喀什发展的内生动力。

王立胜：应当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智库，就是要按照智库的目标进行建设。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给政府提供科学的对策和建议。政府怎么去决策是他们的事，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个一个的具体建议。

姑丽娜尔·吾甫力：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行动者，没有作为一个思想者，觉

得政府的决策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观念培养了我们的惰性。希望“喀什噶尔学”能激发新疆特别是南疆各民族学者，把自己作为思想者而不是知识的储存器。希望喀什能迸发出思想的能量。喀什在历史上曾是文人荟萃的思想文化高地，如果说在当下新疆思想文化能产生具有本土特色的创新学说，我想就应该在喀什。因为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对喀什的战略定位是其战略和政策后盾。让喀什成为新疆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标杆，我想喀什应该有这个经验和自信。

王立胜：喀什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任何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都应该有科学的依据，不能仅靠领导拍脑袋或者只是等待上级安排工作。决策只要是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各级党委政府就可以主动地开展工作，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上级的指示。也不能仅仅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决策。

姑丽娜尔·吾甫力：对喀什历史文化的研究，会激发新疆各民族学者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在动员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力量的同时，也一定要注重培养本地能叫得响的专家。正像您所说的，喀什噶尔研究院应该成为思想的高地。

王立胜：要培养本地的力量，能推出本地的学者，对喀什社会文化发展一定会有很重要的作用，喀什要有一大批专家，政府在哪个方面需要决策，我们就可以马上提供有关的材料和数据，甚至成熟的建议。

姑丽娜尔·吾甫力：但是恰恰我们喀什太缺乏这样的人才，现在已经影响了喀什的发展。但是政府却很不以为然。

王立胜：所以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才，作为一种区域研究，不是一种学科研究，各种人才都需要，各种学科要通力合作，突破学科的限制，树立问题意识，做必要的综合性研究。

姑丽娜尔·吾甫力：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喀什噶尔学”的研究，以及如何发挥“喀什噶尔学”研究的作用，在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我的理解是，在整理历史文化资料的基础上，立足当前，把喀什噶尔学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家在新疆特别是南疆的一个思想库，对周边国家关系的资料库和有影响力的信息源。但我们以往对于“喀什噶尔学”的认识，就是整理一下史料，出一些期刊，召开一两次会议。如果是这样，说实话，那就会和以往的喀什噶尔学会一样了。

王立胜：这件事情上也要发挥您的能动性，动用您的人脉资源。研究新疆的有哪些人，其中您熟悉的有哪些人，都需要您来参与并做大量的工作。我们一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

姑丽娜尔·吾甫力：我们现在主动作为的意识很淡，忧患意识较差，领导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说就不做。所以喀什虽然有一所高校，但是难以出现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思想和知名学者。

王立胜：您就是研究新疆、研究喀什的知名学者。您的许多著作我都读过。如果喀什大学能够如期建立起来，利用喀什大学这个平台，喀什大学责无旁贷应该承担研究喀什的责任，您就会成为喀什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姑丽娜尔·吾甫力：很遗憾，有些时候我的情况很像“墙里开花墙外香”。

王立胜：姑丽娜尔教授，您是喀什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喀什学界的领军人物！

姑丽娜尔·吾甫力：谢谢您的鼓励！这个我确实不敢当。我只是做了一个喀什人份内的事。我还应该做得更努力才对。也是因为现在喀什固有的传统，一些惰性也在影响我，做得也很难。

王立胜：还有一项急需要研究的东西，就是目前喀什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作为情绪，对于某些事情，一个人的情绪也许并不重要，但是一种情绪如果累积形成为社会情绪，那就很重要了。社会情绪根源于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根源于社会群体对社会事实的心理反应。如果社会群体都对某件社会事实产生相同的心理反应，那就表明社会心态的具体生成。这种社会心态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语言中有所公开反映，那就意味着一种社会情绪的形成，社会群体如果都有这种情绪表现，那么，这种社会情绪就有向某种社会行为转化的可能性，只是需要一个时机或者契机了。像2013年和田“6·28”群体聚集闹事案件、阿克苏“8·08”聚众打砸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几百人瞬间集合起来，绝对不是一时的问题，一定有一个情绪积累的问题。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某个关键时刻，只要有人一起哄，这种社会情绪立刻会转变为社会行动。所以，我认为

新疆维稳，要切实加强社会情绪的研究，要加强社会情绪向社会行动转化的调控。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教民都是敌人，但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在某种事情的引诱和刺激下，在特定的场合下，一般的民众特别是教民，会产生难以自控的过激反应。这就是说，真正的敌人是少数，但这些少数的敌人可以利用某种工具比如宗教刺激这种社会情绪进而调动群众参与集体行动。在新疆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认真分析社会存在、社会心态、社会情绪这几个重要事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握住这几个相关项在实践中的耦合点。利用其中的客观规律来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

通过认真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参与“7·5”事件的人，并不天生就是恐怖分子。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三派，我们要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鼓励左派，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大多数人都是被极少数人利诱蛊惑参加活动的。在新疆的现代化实践中，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都是连为一体的，但这些问题的激化和爆发，一定会首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情绪，沉淀为一定的社会心态。社会稳定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这种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把握和控制。尤其是要关注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复杂关系。有些研究者恰恰是忽略了民族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宗教因素。比如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胡鞍钢、胡联合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问题，我们且不说这种设计的具体细节问题，其中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这个设计抛开了宗教的社会背景，单纯就民族问题论民族问题。就凭这一点来说，其可行性就已经大打折扣。

姑丽娜尔·吾甫力：关于胡鞍钢的理论，从我的理解来说，应该是对少数民族现状了解得不够、对中国的伊斯兰教文化现状了解得不够。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自己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我们现在把宗教问题太放大了？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一个民族的正常生活的话，信教群众有宗教生活，但也有世俗生活。如信教群众除了做5次“乃麻孜”，参加正常宗教活动以外，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还是正常的世俗生活，他们有正常的需求，吃穿住行，参加娱乐，有正常的婚丧嫁娶，结婚生子，与我们没有区别。他们要培养孩子，参加社会活动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信教群众似乎是一个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另类的特殊群体，似乎他们一天24小时除了宗教生活之外没有任何生活。这种对信教群众的想象，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影响了内地各民族对新疆的认知，强化了信教群众对自我认知的固化，更影响了我们对问题的判断和决策的选择。一个成熟的、自信的宗教，或者说是信教群体，是不会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也不会排斥他者。这也只能说明信教群体文化能力的薄弱、思想理想的薄弱和不自信。这才是关键。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文化需要有世界眼光、人类关怀，也还要有国家情怀。这样才能是一个成熟的、自信的宗教文化。对此，我们的研究专家、决策智囊们应该有所了解。

王立胜：确实是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也许存在把新疆的宗教问题放大了这种情况。但我说的是“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设计者没有考虑宗教社会这种背景，或者说把宗教因素完全抛弃了，仅仅单纯地考虑民族问题的解决。这似乎又把宗教的影响给舍弃掉了，这也是有问题的。我也非常同意您所讲的，好像南疆的教民除了宗教生活没有别的生活了，这种理解把所有人都设想为宗教人了。这种思路如果表现在决策上，那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宗教工作了。这恐怕存在更大的问题。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如您所讲的，恰恰是政府的一些做法“强化了信教群众对自我认知的固化”。

姑丽娜尔·吾甫力：还要关注对伊斯兰教中积极因素的吸收，把它与现在利用宗教进行极端分裂活动的势力区分开来。伊斯兰教的思想核心是追求、道德公正和善。与新疆的其他新疆的突厥语民族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相比，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信仰伊斯兰教相对较晚，加之他们的一直保持游牧生活方式，在文化、书写、礼仪等方面，与较早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还是有一定差异。维吾尔族很早就离开了马背，进入定居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文化对维吾尔族的影响就更大一些，产生了伊斯兰教文化影响下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了具有维吾尔特色的伊斯兰思

想文化体系，这应该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关键。这些都对现在的维吾尔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影响。

伊斯兰教强调以道德为核心，追求公平正义，不讲权贵尊卑。比如做礼拜时我是贫民，我第一个到，我就在第一排，这跟世俗权力没有关系。这种思想对维吾尔族的世俗的文化艺术等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期的维吾尔族麦西来甫活动中，即使是地位再高的达官显贵，都要遵守麦西来甫规则，不分身份地位地参加这个民间活动。所以相互理解和尊重、遵守公平正义的原则，不仅在《福乐智慧》这样的思想大师的著作中有，在今天民众的观念中也有。比如《福乐智慧》，这是一部重要的思想文化经典，非常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公平，指出国家强盛的核心就是公平正义，如同太阳不偏不倚普照万物。所以作品中的主人公国王，就被取名为日出，指出他的特征就是公正。这些都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命题相契合，需要我们进行很好的阐述，为我们今天服务。如果对伊斯兰教内涵有一定的了解，可以帮我们疏导问题，而不是把宗教想象为迷信，想象为极端。尤其是伊斯兰教强调对个体的尊重，这是需要我们在当代给予阐发，从而对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揭露和修正。

这些年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伊斯兰文化研究得比较少，才会出现许多误区和盲点，所以需要我们对伊斯兰教的研究，用研究成果和事实，为政府处理和解决问题提供依据。再说到一些妇女穿戴宗教服饰，有些确实是有图谋，有些可能是出于周边舆论环境的压力，为什么这么穿，也许连她自己都不清楚；也许是出于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盲目跟着外面的习俗周。所以，对同样的现象也要有所区别。关键是把握好宗教的核心，伊斯兰教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与中华文化相对抗的呢？在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一直都是相互交融、和谐发展。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伊斯兰世界一直都是知识、智慧和善的象征，所以在伊斯兰教经典中就有“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你也要去追寻”的说法。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知识文化的魅力是强大的也是经久不衰的。最近我看到一本《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讲到自古以来在阿拉伯人眼中，中国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是文明的故乡。

王立胜：现在美国人最担心的，就是伊斯兰教与儒教的融合，强调将来世界上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就是怕伊斯兰教和儒教联合起来对付基督教。这是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时的文化思考。

姑丽娜尔·吾甫力：是的。在很多方面，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有相同之处，如内敛的、思辨的思想特点等。所以在与伊斯兰教的交流方面，中国有很多优势。其实我们也不必总是以美国为参照系，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有许多互补性，完全可以找到一条不同于美国的、古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之路，这是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无法做到的，关键是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跟着美国的思维走了。对待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国各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文化，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有别于美国的独立的立场，这将会有利于将中国梦变为我们的家乡梦，共同构筑起一个色彩斑斓的中国梦。

王立胜：建议您继续思考我们以上谈到的两个问题：一是考虑“喀什噶尔学”的研究问题。二是文化产业的规划和发展问题。这是我们最近急需开展的具体工作。

姑丽娜尔·吾甫力：好的。我一定会尽力，也感谢您今天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机会、学习的机会。最近我要到澳大利亚访学，期间我正好有时间去认真思考您的问题和要求。

王立胜：好的，等待您满载而归。

【论 文】

社区的“多民族化”与民族关系的制度化

常 宝¹

摘要：在多民族国家城乡社区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现象，即社区“多民族化”问题并不是当代社会的专利和发明，而是古代社会已有的特征和社会关系模式。进入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基层社区的“多民族化”现象日益显现，随之而来的民族关系演变直接推动了社会结构性变迁。作为社会结构的各项制度，需要进一步调整其框架和意义系统，并对多民族社区中的社会关系予以关注和干预。社区“多民族化”本身并不是问题，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只是过去，在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制度对社会变迁过程仍具有引导和重构作用。这是经济与文化发展、市场机制调整与多民族社区个体和群体健康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

关键词：社区 “多民族” 民族关系 制度

一、关于“多民族”视角

关于“少数民族”，学者认为：“近代中国人使用的‘少数民族’概念，主要有清末排满革命思潮，一战后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条约’，以及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三种主要的思想来源。”²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概念有明确的人口指向，“少数民族”就指人口较少的民族群体。

“民族”，作为一种独特概念，在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与政治话语中形成，它既不等于英语世界里的“nation”，也不等于“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概念，它具有显著的中国本土意义的群体分类特征和意义。在当代政治话语和社会互动中，“少数民族”与“民族”概念之间常常出现交互使用现象，有时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具体而言，中国有56个民族，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类型和时空格局等原因，将除了汉族以外的人口较少的55个民族习惯上叫做“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话语中，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地或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混合居住地区统称为“民族地区”，将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少数民族人口和社会制定实施的制度称作“民族政策”。

针对类似政治话语与社会习惯性概念的含糊性与模糊现象，笔者提倡将少数民族人口混合居住地区统称为“多民族地区”或“多民族社区”。“多民族”概念，无论在政治话语、文化系统和治理机制中都具有其“社会关系”视角。换言之，在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中，民族关系是不可忽略的指标。多民族之间历史以来形成的“关系”是描述和解释多民族社会环境和意义的重要变量。从“关系”视角审视和分析当代民族问题时关涉到民族地区政治权益、人才市场、社会资源、地位分配和精英培养方向等一系列问题，甚至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民族心理调适、社会流动等诸多方面。

民族关系是民族政策的基础性条件，民族政策是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在中国，民族政策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人才体系之间搭建了不同的通道，从不同通道走出来的社会成员和精英群体，汇集在人才市场，在社会资源分配和文化资本运用的关口上相遇，其中民族政策具有调节、整合与维模功能。民族政策在历史与现实、不同文化与价值之间建立民主、平等的“堡垒”，

¹ 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 社会学民俗学学院 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² 杨思机，“‘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在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研究中，研究的范式和视角不断被更新和调整。“从实体论到关系论是当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根本没有必要做出这些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社会现实的内容既体现在行动的现实，也体现在结构的现实，二者同样重要，就存在于关系之中。”¹ 因此，社会关系一直成为社会研究的核心议题，尤其在社区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社会关系不仅是社区文化、人口结构、情感和认同的先决条件，也是社区互动、社会行动的结果。社区的“多民族”化使社区文化、社区互动模式和社区关系多元、复杂化，在传统社区演变、当代社区重建过程中民族关系成为一种新指标，“多民族关系”视角可以为多民族地区国家制度、社会政策提供新的视野。

二、社区的“多民族化”及民族关系

在西方社会研究中，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最早提出“社区”（即“公社”，community）的社会共同体概念，将传统“社区”和现代“社会”区分开来，认为传统“社区”与现代“社会”共同体内部结构、理性化程度与社会关系截然不同。社区有古老、现代之分，有大与小之分，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社区都不同，且变化多端，具有显著的“弹性”特点。社区社会关系是社区文化、精神与认同的直接或间接表现。

（一）农牧业社区“多民族化”

在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不是居住在城镇社区，而主要集中在边疆边远地区和农牧业社区，“大散居、小聚居”成为中国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格局的重要特点，广大农牧业社区，尤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属于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近代以来，大量汉族人口移居到边疆草原沙漠地区之后，传统单一民族社区逐渐演变成多民族社区。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草原深处的纯牧业社区——呼尔其格嘎查为例，20世纪中期外来移民的到来使得这一单一蒙古族人口社区转变为多民族社区，外来移民人口中有河北、山西等地汉族农民，也有从赤峰、通辽等地移居过来的蒙古族农民，大部分外来农牧民都从比较贫穷的地区或灾区迁来，他们迁移的主要目的为改善生活、提高收入，养家糊口。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和发展，该牧业社区已变成多民族人口社区，当地蒙古族牧民与外来汉族、蒙古族农牧民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稳定，在牧业与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不同民族人口有着合理分工和密切合作。如今，几十年前迁入本社区的大部分汉族农民和他们的后代基本都迁移到旗（县）所在地，仍然从事他们擅长的修车、盖房和经商等工作，与当地牧民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形成牧业社区外围人口群体，生产生活上的互补性依然很强。

位于内蒙古东部的通辽市是内蒙古蒙古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约占整个内蒙古蒙古族人口的1/4。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通辽市科尔沁蒙古族与汉民族、农耕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十分密切。尤其近代以来，该地区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90%的蒙古族放弃了传统牧业经济，转入半农半牧甚至纯农业生产过程，与汉族与汉文化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多民族社区。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科尔沁蒙古族在语言、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上与其他地方蒙古族产生很大差异，但他们的社区认同、文化认同和自我民族认同依然很强烈，很多民众与精英仍把自己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人口清晰地区分开来。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很多单一少数民族社区变为多民族混居的社区，在不同民族人口之间的相遇、交往和竞争过程中，民族成员自我认同得以加强，社区认同不断复杂化，社区民族关系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当代很多农牧业多民族社区民族关系中，由于原住民族成员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内容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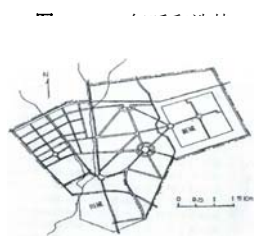
¹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

占主导地位，他们始终主导着民族关系的性质和行为形式，汉族等外来移民人口占少数，处于非核心地位。

（二）城镇社区“多民族化”

如前所述，历史以来，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地处高原山区的传统农牧业社区，城镇社区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人口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人口城镇化潮流的产物。目前，国内很多城镇出现了很多民族社区，多民族人口混合居住情形是城镇社区的新特色。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蒙、汉、满、回等多民族长期以来在不同社区居住、生活和生产，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尤其在人口快速城镇化、市场经济、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多民族社会分层、人口空间分布、资源共享等方面形成了特色，构成了边疆少数民族城市化过程中的核心区。

清朝之前，呼和浩特（库库和屯，明朝称“归化”，清朝称“绥远”）还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传统农牧业社区，清朝建立后大量汉族和满族人口涌入呼和浩特，迅速推进了该地区社区多民族化进程。近代以来，汉族人口的迅猛迁入潮流使得呼和浩特一夜间成为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社区，解放前的呼和浩特已形成由新旧两个城区组成的多民族、多部门，国家与地方权力交互相争的政治文化社区，如下图¹。



1949年以后，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以干部、知识分子精英为主体的蒙古族人口从内蒙古东部、中部不断涌入呼和浩特，多民族社区居住格局逐渐形成。随着社会的结构性演变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机制建设、城区改造、土地开发、民族文化发展和社区营造的新政策、新局面的作用下，购房、拆迁安置、城市外来人口的迁入和迁出过程越发显著，对多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居住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呼和浩特市蒙、汉、回三个民族的居住格局特征为：（1）依然保持历史文化原因形成的聚族而居的特点，蒙古族聚集在新城区，回族人口相对集中于回民区（旧城），汉族散布在城市大部分区域；（2）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因素逐渐影响了传统“单位制”，使“民族单位”背景下的民族单一聚居向多民族杂居转变。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原称郊区）出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社区。在新城区，以电视台、电台、出版社、报社为核心的民族媒体社区，以呼和浩特蒙古族学校为中心的蒙古族居住区逐渐形成，除了回族人口外，市区各民族居住格局没有明显的集中特点，大体上呈网状分布情形。

从古至今，呼和浩特是个多民族频繁互动，民族关系十分复杂的地区。呼和浩特蒙古族、满族、回族和汉族等四大民族人口开始居住的时间都比较早，因此这多民族社区社会结构稳定、民族关系形式与性质早已定型，相对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在长期的社区演变过程中经历了考验。目前，虽然蒙、汉、回三个民族居住相对“隔离”状态没有彻底改观，但多民族杂居状况日益明显，为当代多民族社区建设奠定了基础。

当代城市多民族社区中的民族关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按照民族成员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1）业缘型民族关系。职业化、专业化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及社会整合程度的重要指标。当代职业场域为不同民族成员的相遇、互动、交流、合作和竞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同民族成员为了工作学习、个人价值实现，在同一个职业领域中出现，通过语言、技能和爱好等产生联系和协调。这是现代社会多民族成员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最重要途径，也是现代社会职业化、专业化所创造的最有力的凝聚力和认同体系。（2）公共型民族关系。不同民族成员在国家制度范围和公共领域内产生互动，彼此产生印象、认知的过程。例如：在学校、公交、医院和社区等公共场域中由于志愿者活动、执行任务或日常生活行为而形成

¹ 引自：顾士明，“呼和浩特的形成发展与城市规划”，《城市规划》，1984年，第4期。

的民族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3) 家庭型民族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由于赡养、收养或通婚等特殊情景而产生情感、互动和认同的社会关系。这是不同民族之间产生的最高级别的社会关系，一定比例（一般为 10% 左右的比例）的通婚等社会现象能够说明该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亲密程度。

三、民族关系的制度化历程

制度产生于社会互动、交流和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制度化进程是与人们居住的自然社会环境和社区结构、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与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在多民族国家与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形式、内容和性质都不同，在和睦相处的社会环境中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自然、自愿性质，而不是在强制、被迫的情景中完成。但国家与社会发展经验表明，在长期的民族关系形成演变过程中难免有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干预、规划和安排，制度在民族关系中始终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多民族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国家制度与社会政策的引导和干预。在历史上的不同朝代时期，从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的民族关系制度和政策条文很多。例如，《唐律·名例第一》中有“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的条文，指出涉及到不同部族之间的关系时用唐朝法令、制度来解决。元朝时期，虽然将国内各群体分为四个等级，但统治者高度重视各部族之间的关系问题，鼓励各部族之间的交流、互动甚至通婚，允许阿拉伯人在内的各部族人到中原居住。清朝政府继承和沿袭以往朝代“土司制度”等诸多民族政策，实施“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十分重视民族关系问题，推行“汉法”、推崇“儒学”，改善了境内多民族关系，巩固了王朝统治。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国家内部管理和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更加严密、全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成为最高层次的法律和国家基本制度，清楚地规划了多民族关系的框架和宗旨，明确规定：“依法制订具体措施，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¹ 国家制定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力”制度化，制度上划清了主体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治边界。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政府也组织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从民族名称入手，确定“民族身份”，进一步划清多民族之间的意识、认同边界，也为民族关系的解决处理奠定了制度基础。从中国多民族交往历史出发，新的政治时期将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作为“特殊公民”，在社会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和政治地位上给予特殊照顾，实施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多民族同步发展、进入现代生活，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中，民族具有历史性、长期性特点，民族比国家与阶级寿命长，即便国家与阶级都消失了，民族依然可以存在和延续，由此，民族关系问题长期存在。进入 21 世纪，世界仍不安宁，世界各国民族主义又迎来高涨及扩散的崭新时代，随着民主、自由意识的不断发展，个体的自决意识不断加强的同时民族的自决也迅猛发展，在一定时期，个体与民族“相依为命”，个体从民族身份和认同中不断挖掘生存的能量和合法性，在新的民族关系格局基础上人们的行为有了多元、复杂的表现。

默顿 (R. K. Robert King Merton) 曾经提出“社会结构与行为类型”关系问题的理论框架，并划分出了三种类型的社会秩序，即接受 (+)、拒绝 (-)、拒绝并代之以新的目标和标准 (±)，这些行为类型在文化目标与制度目标之间交叉构成，可以在民族关系行为分析中借鉴运用，如下表：

¹ 《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2005 年 5 月 11 日国务院第 89 次常务会议通过。

表 民族关系行为类型与社会结构

民族关系行为类型	文化目标	制度目标
创新（或改革）	+	-
隐退（或回避）	-	-
反叛（或抗争）	±	±

在当代民族关系中蕴含着行为意图和方向，作为社会规范的制度，对民族关系及其行为予以关注和引导是社会的需要。由于当代民族关系的演变，在民族成员个体和群体行为中产生创新（或改革）、隐退（或回避）、反叛（或抗争）的行为时，国家制度和地方政策做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是必然的过程。当然，国家制度和民族政策不可能是民族关系中的个别现象的产物，制度与政策有其稳固性和长期性。就像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哪些地方出了点事，不能说这个民族自治地方就有问题，也不能说制度有问题，极少数人闹事，不能与民族全体捆绑在一起’，‘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事不能与实践已经证明并长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捆绑在一起’”¹。

四、社区演变与社会关系制度化

从另一角度看，社区是时空的产物，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演变是社会变迁的直接反映。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尤其 90 年代市场机制的建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和细胞，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演变。中国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的调整引发了社会全方位的变迁，为社区变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行政单位、企业单位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国家与地方权力格局得以调整，出现人口城镇化、老龄化和文化多元化等诸多现象和社会问题，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在社区内部关系、社区与社区之间的互动、连接问题上

首先，社会职能的分离和分化为社区功能增添了新的内容，社区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社区开始扮演和替代传统“单位”角色，不仅需要在生活空间、社会环境上提供保障，也在文化与精神上创造力量和认同。其次，国家与地方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府改变其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手段，对社区和社会的干预逐渐减少，“大社会、小政府”成为社会改革的目标，社会自主性不断提升，政府分离出来的权力和资源通过社区来重新分配，社区在政府与民众、集体和个体之间扮演了桥梁作用。再次，社区内部家庭结构、社区组织和个体的变迁，尤其是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关系的变异等现象引发了青少年教育、亲子关系、老年人口养老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社区人口结构、文化与生活方式多元化，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之间的情感、价值冲突和差异日益凸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治理成本不断提升。

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渗透，多民族在内的边疆农牧业社区也不例外，同样经历着急剧的变迁过程，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多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在多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中，不同民族历史记忆、文化形式、经济类型和土地、草场、社会声望、符号和印象都成为相互争夺的资源，当代大小民族主义在广阔的城乡社区时空中不断被演绎、复制和重新创造。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问题上，为什么出现制度化现象？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民族问题及多民族关系问题也不断涌现，在经济建设、市场机制的建立和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在民族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问题中获得新的表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关系问题出现复杂化局面，民族关系的调整和制度化需求再次升温。少数民族精英、民众和学界重新思考、审视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制度化问题，新时期多

¹ 高峰，“正确把握当前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人民政协报》，2015 年 7 月 16 日。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分配是否存在不合理性？民族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和完善？民族关系是否进一步研究？等议题摆在人们面前。

与全球化让世界变成“地球村”一样，城镇化、网络化进程使得传统多民族人口重新组合、分布在城乡不同社区，社区内部结构重新被调整，多民族人口居住格局在有些城市社区中出现了相对“隔离”特征，而有些社区出现了理想的“三交”（交流、交往和交融）状况。

制度化对多民族社区的功能或作用有两种：首先，制度化是多民族社区个体和群体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保障；其次，制度化为社会演变和发展的方向制定了框架，有利于建构社会有效秩序及其良性运行。当代居民对社区文化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各民族居民要求有一个安定祥和、团结友爱、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获得认同感的社区文化环境，社区居民日益重视归属感和认同感。可是，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社区环境中人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十分复杂、多变，营造良性的社区文化环境、构建和谐和社区民族关系是十分漫长的过程。

五、结语

据说，梁漱溟始终考虑和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¹ 如何面对、理解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如何把握中国社会向何处发展等问题早已成为摆在我们几代人面前的重要议题。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进程，国家与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演变，其中各族群、多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局面，“多民族”的“关系”视角应成为研究民族社区的基本途径。多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现象是社区的“多民族”化，随之而来的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交往的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当代社会变迁，更多是社会结构性变迁问题，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关系的调整需要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和营造，即制度化过程。

诚然，社会变迁与社会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国家角色、地方治理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多民族社区、多民族关系的演变与社会制度化是相辅相成的过程，尤其多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直接影响着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制度化是民族社会的需要，也是民族个体和群体发展的基本条件。

参考文献：

杨思机，“‘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2005年5月11日国务院第89次常务会议通过。

汪东林著，《梁漱溟问答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¹ 汪东林著，《梁漱溟问答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编者按】

我们在《通讯》第 213 期刊载了尼玛顿珠对“艾滋喇嘛”邱华绒吾的采访，生动地展示了藏区艾滋病的发展现状和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的辛勤工作。本期刊载的是对这位“艾滋喇嘛”的第二次采访。在这些对话中，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基层藏族社区的艾滋病防治现状。艾滋病的治疗过程十分复杂，如果基层机构简单处理，则有可能出现一些患者对用药效果甚至政府用意产生质疑等各类问题。艾滋病对地区偏远、医疗条件较差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危害极大，希望大家能够加以关注，

【田野调查】

对邱华绒吾的第二次采访

（采访时间2016年6月21日，成都）

尼玛顿珠¹

邱华绒吾（以下简称Q）：我给他们（甘孜州医院）提了一些要求（邱华绒吾老师此时已经辞职，准备去甘孜州医院）。第一个，我在之前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现在大部分时间放在防治艾滋病上面，大部分时间都是下乡和老百姓宣传，而不是在办公室里；第二个，甘孜州医院只在甘孜州内开展送医下乡的工作，我不想只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内开展；第三个呢，现在我已经和慈诚罗珠堪布他们的协会已经说好了，跟四川省卫生发展促进会也在做一些工作。我不想这些受到影响，所以我就提了三个要求。说实话，我从温洛克出来之后，一要为我的生存考虑，因为艾滋病工作这一头，我是不会有收入的，如果说有收入的话那就……（笑），那就是这样一个事情；第二个，之前在藏区的NGO没有干成，我自己也想过是哪些原因，但是一直没有更长的时间去实践，我想经营一些卫生用品的销售。我前些天已经在谈，我今天看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我想过去再详细地和他們合作。

第一个是经过这几年我跟老百姓宣讲，我发现老百姓的很多卫生用品，包括安全套、女孩子的卫生巾、包括小孩子的尿不湿，没有一个质量好的。在藏区尤其是我们甘孜、阿坝、青海果洛、玉树地区更为严重，其他地方可能还稍微好一点。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些卫生用品，更不要说艾滋病检测试纸，这些藏区根本拿不到，到疾控中心去做检测时，必须进行实名制登记，所以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去正规的疾控中心），担心……（自己的身份信息被人知道），这些情况都有。我想……网上的话可以随便买，淘宝、天猫、亚马逊很多平台都可以买到，但是老百姓不会操作，不知道这些用品叫什么，不知道怎么买，也担心一些钱的问题，怕受骗。所以，藏区就是需要这个窗口，民众可以用藏语、藏文在网上购买。我现在去谈的就是这件事，我相信只要前期有一些较大的投入的话，这个价格是可以降下来的。然后，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个牌子叫做“准信”，是“ACCU”公司开发的，“准信”的梅毒检测试纸现在市面上大概是39元到40元钱左右，这个我签合同跟他们合作，我完全可以做到30元、35元钱左右，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可以用藏语进行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老百姓需要这样的项目。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不能全靠别人的资助，还是需要一些自我造血能力。尤其是像我们的一些感染者，艾滋病感染者不像其他的疾病，求助时没有办法在微博、微信上公开说谁病了，在什么地方，然后提供电话号码等信息，不可能这样公开。虽然我也通过自己的朋友圈招募过一

¹ 采访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些募捐，老百姓中捐助的人还是很多。比如说上次我招募，我们花了七个小时就捐到两万块钱。但是我相信百分之九十的人捐钱是相信我这个人，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的。

但是，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人们觉得声称自己或朋友患艾滋病就可以募捐的话，很多假的募捐会出来，绝对会有。就算你手上没有任何病人，你也可以招募，别人也不可能问病人是谁，不能要求你拍照片，所以什么样的假的都会出现，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生态。所以，我在想以后有没有办法不通过这些途径来为他们求助。我们的这个日用品，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卫生用品出售，我在收入里面有一部分用来经营，有一部分就用于志愿者，比如说每年我的“防艾万里行”，这个差不多每年要花费五万块钱，能开展这个活动，每年再帮助一两个感染者，那就已经非常好了。我的目的不是在这个上面赚钱，是能够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质量好的、价格比较便宜的产品。

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来维系其他工作，我这几天一直请我们家乡的一个小伙子过来。这个小伙子来自我的家乡，他的文化水平，不管是藏语汉语和数学都非常强，但是可能是自己优越感太强，反而一直没有考上公务员。我自己分析，那个时候他在整个乡里都非常有名，考试的时候那天他可能状态不好，很多没有任何名气的人都考上了，这可能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后来就一直考不上，而且一直不愿意再去考，然后变得自卑感比较强。我这几天就天天带他去见一些朋友，我希望能够让他从哪个阴影中走出来。我相信这样能够将他的自信找回来，他绝对是最好的，现在问题就是还没有找到这个自信。这个人现在已经来了，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弄这个微商，希望可以直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可以直接在上面购买。我昨天操作了一下，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我就让他准备一下藏区各个地方的地址，老百姓可以告诉他自己在什么地方，让他来帮助写地址，因为老百姓不会写地址，也不会通过微信支付。我给他说的是，要能够尝试一个更加大胆的，能够货到付款。老百姓用网上买东西，先付款可能有点担心。可以看看如果货到付款的话，到底会有多少人付款。想尝试一下，到时候也可能连成本也要不回来。

尼玛顿珠（以下简称N）：但是货到付款的话，是不是要跟快递公司签协议。

Q：对对对，这个应该怎么办？

N：货到付款的话就是需要跟快递公司签协议，快递员会代收你的货款。我从你这里买东西，肯定不是你自己亲自来送货和收钱，而是物流公司代你收货款，通过物流公司最后把货款付给你。由于有的快递公司不接收“货到付款”的业务。所以还要跟快递公司协商。

Q：对对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正在联系藏区的一些联系人，比如说我在每一个县里面安排一个人，给他一个我的检测试纸，我最关心的就是有了检测试纸之后，老百姓可以自己检查，他们不愿意到疾控中心去检测，很多人都担心信息泄露。我相信只要自己可以进行检测，如果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的话，我相信百分之九十的人是不会故意去传播的。我相信这个百分之九十的人当中，百分之四五十的人会来找我，因为他们感染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途径治疗，因为他们没有到疾控中心检测。我们也会明确告诉他：你到疾控中心去检测是免费的，但是你也会有其他的选择。其他的选择就是你到计生办、妇联、疾控中心去领取安全套是免费的，但是我们这边也有一些。我们每年的“防艾万里行”会免费发放安全套和检测试纸。

但是检测试纸免费发放是不是合法，我正在查这些资料。而且我正在和一些公司联系，比如说艾滋病检测试纸和梅毒检测试纸，这需要他们给我授权，这也是保护了我，因为我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政府可能会对这类事有点担心。我们掌握这个数据也好，在网上都是谁都在卖。现在淘宝、天猫网上各处都在卖，到处的商家都在卖，但是藏区不一样嘛，我会考虑这个方面。如果我没有拿到这个方面的授权书，我就不敢做。但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做这个生意的，我们只卖他的产品。然后，我经手的任何一个产品，安全套也好，都会附上一个藏文版的说明书，图文并茂的，这样老百姓就都能看懂了，然后这个质量也有保障。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在藏区开展工作就更方便一些，我们就可以在给这些老百姓做好心理辅导之后，让他们到疾控中心去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物，这是最好的。我相信这也是政府部门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前期的

心理辅导和服药过程中的这个关怀和随访工作，这些我们都可以做，这两个（跟甘孜州医院联系和成立藏区的药品销售网络）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

N：从事筹备工作的除了老师您之外，还有别的志愿者吗？

Q：在成都没有，所以我现在正在考虑，如果我的卫生用品这些做了以后，先开一个微店，通过网上来发货，慢慢老百姓接受之后，就在藏区的某个州里开一个实体店，是有我们自己的牌子的实体店，然后在这里销售，再以后就把这个模式复制到藏区各县、乡，对于销售人员，我们专门对他们进行培训，培训一些艾滋病、包虫病、结核病的知识，然后让他们学会怎么操作。老百姓用完的这些会产生一些垃圾，尤其是艾滋病检测试纸更会产生一些比较危险的垃圾，比如说针头这种都会导致艾滋感染，所以这些垃圾的安全处理需要考虑。这方面如果不考虑，危害就很大。

N：那像针头这些垃圾，现在的疾控中心是怎样处理的？

Q：艾滋病患者用的针头一般是这种，不像医院里面那种。我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些东西送到正规的医院的医药垃圾处理点，这是最理想的。能不能所有的人都做到这一点，也是问题。还有一些就是卫生巾、尿不湿之类的用品，虽然很多藏区老百姓已经在使用，但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卫生巾，他们在用自己的一些布。不过比起藏区现在市面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自己的布还更卫生一些。但是如果推出这些产品，可能会有更多的老百姓会使用。卫生巾和尿不湿都会产生垃圾。这些垃圾有没有可能运到县上、乡上的垃圾处理点，这是比较理想的。所以，我们考虑的问题比较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艾滋病检测试纸这方面垃圾如何处理，这需要重点去考虑。

（一个志愿者来电话）

我们的一个志愿者在玉树，我昨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果洛，因为那边有个防艾协会。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果洛的这个防艾协会是做得很好的，我想我们应该去向他们取经！疾控方面各地也有一些防艾协会，但是果洛那个协会确实实在知识宣传方面做得好。首先他们自己掌握的比价好，但是他们没有关于感染者关怀的经验，所以邀请我们来，去年我专门去那边给他们培训，今年我让另外两个志愿者过去。我的经验是这样，现在的藏区不管是哈希·扎西多吉也好，还是微博上的扎西桑俄也好，还是扎琼巴让，他们都很有成就，但是个人魅力太大，没有能够培养出跟他们一样的人才，所以每年的培训都是我去，但是这样也就是我自己的得到锻炼，其他志愿者得不到很好的培养，所以我就想让其他志愿者去。前几天我派了一个人去，他在艾滋病知识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是一个和尚，而且曾经是相当于堪布这样等级的，后来还俗就专门做这个工作。

（来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理塘县疾控中心的，今年这个“防艾万里行”我觉得很有成果。你看……（给我看文件）各个地方的卫生局、理塘疾控中心、卫生局、宣传部盖了章的，他们说这还不行，必须要有州卫计委的章，现在办事麻烦得很。上次省民宗委说给我一些钱，让我去一百个寺庙去宣讲这个结核病和包虫病，我就特意借这个机会讲艾滋病，他们有一个三十万元的项目，就是去寺庙宣讲。我跟他们说，把这笔钱给甘孜州卫计委，让他们负责组织，宣讲时邀请我们这个团队来讲。这样的话，甘孜州卫计委就可以给我们盖章，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乡下去，因为他们自己去不方便，我就对他们这样说，这样九月份之后，我们去藏区所有的地方就有通行证了，在甘孜州就没有问题了。今年我去了十一个县，拿到了十个县的证书，这是很了不起、以前没有做到的一个事情。

N：老师您今年总共去了多少地方？

Q：十一个县，今年没有像往年去了那么多县，但是今年的活动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我拿到了这些证书，如理塘县刚刚换了县长，他们有这个要求，其他县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N：以后下去的活动就会方便很多。

Q: 是的, 会好很多, 有的文件就会好很多。

N: 那今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吗?

Q: 收获怎么说呢, 甘孜州那边的的工作还是特别难, 有的时候我必须用汉语讲, 因为我不能用我的安多方言讲, 那样不仅是当地老百姓听不懂, 连我们的翻译人员都听不懂, 所以的话我用汉语讲, 他们再把汉语翻译成他们的康方言。所以这样就比较累。但是, 在一些以前我们的志愿者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们也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年轻人, 包括邀请我们来这里的防艾志愿者, 当地到处都有我们联系的志愿者, 这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跑来跑去的开支比较大, 但是到了那里民众又听不懂我们的话, 所以能够在当地培养一些志愿者就比较好。所以, 今年我觉得这个(证明)和这个是今年最大的收获。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持续的……

N: 现在, 老师您们就是以防艾协会的身份去做宣讲?

Q: 对啊

N: 当地的卫生局等机构也有自己的宣讲吗?

Q: 哎呀, 很多都是假的。如果说没有, 那是不正确的, 但是只有每年十二月一号有一个活动, 但是这个也只是在县城的广场上, 放一个展板,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发放安全套, 录像拍下来, 然后上网做个宣传册。上次很多人告诉我, 包括理塘那边疾控中心的人告诉我, 他就发现他们单位的一些女孩子到幼儿园门口去发放,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多, 幼儿园门口有很多小孩, 有些老人来接孩子, 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所有的人都在拿。这些人就到幼儿园门口去发, 安全套发给小孩和老人有什么意义? 而且他后来发现, 小孩在街上吹这个安全套, 很不好。有些宣讲就是走的这样一些形式, 但这些机构自己可能会说组织了很活动。像甘孜州我相信今年是投了很多钱, 你到甘孜州去, 一路上就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大的标语, 这样一个标语可能一年都要二十万左右, 尤其是整个康定城, 汽车站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艾滋病方面的标语, 虽然没有错别字, 但是这个标语能起到多少效果, 真的不好说。

N: 那老师您做了这么多年艾滋病的工作, 现在下到基层, 有没有感觉在下面对艾滋病的观念等方面, 有一些变化?

Q: 有的, 这个效果很明显, 就像现在对安全套和检测试纸这方面的咨询特别多。我们跟他们说, 在淘宝上可以买, 也可以到疾控中心拿, 但是他们还是不懂。所以有一些人就会给我地址, 然后我自己在淘宝上给他们买。你看, 这些就是。(给我看已经买过的一些订单) 这些就是我只买完了之后给他们的。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对所有这些咨询的人说我可以帮忙, 那我就做不了防艾工作了, 因为天天要把时间花费在这个上面。

N: 所以其实老百姓对于政府不信任, 其实是跟政府自己的做法有关系啊。

Q: 说实话, 这对政府和老百姓都是损失, 两方都是非常大的损失。造成这个不信任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只是表面形式; 第二个, 我对拉萨那边的情况不知道, 但是在甘孜阿坝这边, 政府也不信任老百姓, 故意做一些不符合老百姓信仰的一些事情。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 老百姓当然就不会信任政府了, 如果把老百姓心里面最神圣的东西在他们的面前践踏, 那他们怎么可能信任你? 出现了这个不信任之后, 国家很多好的政策也就没有办法落实, 比如说防治艾滋病的政策。老百姓一方面是不相信有这个治疗的药, 不相信政府会提供免费的药物。

有些人传播谣言, 说如果得了艾滋病, 政府会杀死你, 政府会把你关进笼子里活活地烧死, 然后埋在地下。其中一些人散布这些谣言有其他目的, 也许有政治目的。散播谣言的人在藏区也是有的, 不能说没有, 有些谣言是感染者自己传播的, 是感染者自己或者感染者家属在传播谣言。

藏区现在很多人关注艾滋病有没有能治愈的药,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政府提供一些免费药物, 但是就是没有人来领取。即使以后有了一种完全治愈的药, 以现在这种状况, 老百姓也不一定拿, 因为他们不信任政府。即使是一个病情完全可

以治愈的患者都不一定去拿政府发放的药。来找我们的这些感染者，我敢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已经到了非常晚期的状况了。我们一般人的免疫力指标为800-1200，感染了艾滋病之后，每年会以100左右的速度下降，下降到200以下，就会增加感染其他疾病的概率，到了只有10来个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还没有服用抗病毒药物的话，那他的生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往往老百姓来找我们的时候，免疫力指标只有100以下。到了这个程度时，有什么风险呢？第一个是会感染很多其他的疾病，就像上次我们有一个女孩子，资料我可以给你拷贝一份，但是你一定要保证资料一定不能给别人。不然的话，以后就没有感染者愿意相信我们了。

有一个女孩子，27岁，感染了27种疾病。另外一个女孩子，免疫力只剩下34，感染了17种疾病，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疾病，肺脏都穿孔了，有个洞洞，这么危险。像刚才这个患17种疾病的女孩子，她开始找到我们的时候，她的CD4也就是免疫力只有34。后来他们家总共花了六万多元，治疗了两三个星期，再去检查的时候，只剩下12个了。

N: 为什么还会变少?

Q: 因为她得的疾病太多了。我陪他们到成都最好的艾滋病医院去，我们希望医院能够尽快给她上那种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医院说他们不敢，因为抗病毒药物药性太强，对肝脏和肾脏的副作用太强，如果以现在这种身体状况上药的话，那绝对第二天就会死，所以就不敢用抗病毒的药物，而是采用其他治疗方法。但是西药基本上都有副作用，这样一折磨下来，免疫力就又下降了。然后医院就骂我们，说为什么不早点带她们来。我们也是刚刚知道啊，没办法，但是确实确实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女孩子正在服用抗病毒药物，现在还好。

N: 什么时候的事情?

Q: 上个星期的事情！老百姓在当地疾控中心上药，疾控中心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在上药前进行检查。艾滋病上药前需要进行一系列检测，比如说肝脏、肺脏、脾胃、肾这些方面的检查非常重要。这次在成都，上药前做了详细检查。如果在甘孜州的话，绝对是直接上药。如果直接上药，绝对第二天就直接死了。你想，如果病人上药后第二天死了，他们的家属会说什么？会说政府下了毒，绝对会这样说的。还有一些人，在免疫力特别低下的时候服用抗病毒药物，副作用特别大。本来我没有任何症状，我觉得自己很健康，只是检测到了艾滋病病毒，第二天去拿药，吃了之后就开始出现副作用，浑身疼痛，出现皮疹，他就相信是政府在害他。这种副作用会延续三个月。很多人在副作用将要消失的前一天放弃了继续服药。就好像有一个成语说，很多人死在命运改变的前一天，就真的像是这样。

N: 因为这个副作用会持续很长时间！

Q: 会一直持续三个月，一些人就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然后病情恶化，后来又再来用药，这样反反复复，身体就产生耐药性，再以后就是这种类型的药一律都不管用，那这个人就完蛋了。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怎么说呢，有些感染者真的是非常不好对付，尤其是有一点点文化水平的，有一点点经济收入的，特别难缠。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感染者，他以前是开卡车的，后来把卡车卖掉了，手上有三十多万，他提出一定要用最好的药，一定要到省医院住院，他不听我们的建议，一定要做最好的治疗。艾滋病不是这样短期可以治疗的，需要长期服用抗病毒药物，长期配合医生，慢慢提高免疫力，是这么一个过程。一个人得病的时间长了，会失去劳动力，这个时候他是最需要钱的。

现在艾滋病的药物有三等，一线药、二线药、三线药。一、二线的药，国内从今年6月15号开始全部免费。以前的政策不一样，只有农村才是免费的，现在对全中国任何人都免费。6月15号出台这个政策以前，患者的免疫力低于500的时候，才能免费。现在已没有这个限制，这是非常大的改善，非常了不起。现在一线、二线的药是免费的，但是三线的药是国内拿不到的，必须要到泰国或者是印度、美国这些地方去偷偷的买。

现在这个人有些钱，就说我要吃三线药物。这是非常危险的举措，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开始通过一些汉族人买到这个药，这是政府绝对是要查的，因为这上面的利润实在太大了，这些人是拿自己的生命在赚钱，绝对是违法的，绝对有人会抓的，一旦这个人被抓，那他的药物来源就断了。这就特别危险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再服用一、二线的抗病毒药物，根本没用了。还不如先从一线药物开始，一般情况下，一线药物服用十年之后才会出现耐药性，然后再换成二线药物，差不多三十年之后才出现耐药性，四十年之后我相信中国也会提供三线药物。即使仍然不提供，我相信那时世上也会出现完全治愈艾滋病的药物，绝对会有的。他现在直接服用三线药物，纯粹就是浪费。

N：所以这里存在宣传不到位，大家对这个疾病还是很不了解。

Q：是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些感染者如果是有点知识的人，最难去做这个辅导工作，他们因为掌握了一些知识，百度了一些药物，他们就不肯对你百分之百地相信，尤其是他的文化水平比你高一点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比你强，他可以自己去咨询，在网上随便搜索。现在网上的许多信息都是假的，编造这些信息的人出于各种目的，比如组织同性恋聚会，或者有意无意传递同性恋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有些是性工作者发布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对艾滋病药物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夸大某种艾滋病药物的药效，比如说某一种药物的作用特别大，说某一种药物最好。网上的一些信息会误导民众。

因为中国这边没有三线药物，很多微博、微信上对三线药物的疗效做了非常不负责任的宣传，好像是几乎可以完全治愈艾滋病。所以导致有些人想放弃一二线药物，存在这种现象。一些有点知识的人不相信你，反而是那些没有任何文化、没有任何知识的人，他完全把你当做一个活佛来看，百分之百相信你，然后让他什么时候吃药，怎么吃，他会百分之百按照你说的去做。

藏区老百姓说的话，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他们服用抗病毒药物也会有一些问题。有些人说因为自己大意，药被牦牛吃掉了，被小孩吃掉了，或者说我这个月要上山挖虫草，这个月可以不吃。我在这边帮助一些人开了暂住证，因为成都这边没有暂住证是拿不到药的。现在很多疾控中心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的病人怎么还不来啊？然后就告诉说发现病人上山去了，电话联系不上。患者自己把原来一个月吃的药分成两个月吃，自己这样决定。有的人就说昨天家里来了一些客人，吃药不太方便就没有吃，问今天可以吃两颗吗？这些人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这些没有文化、没有上过学的人，更加相信我们的话。

上次我跟我你说过，有一对母女来找我，刚开始找我的时候，身心非常憔悴，然后我们到那边去做检测，检测结果一出来，这个女孩子自己就瘫下去了。母亲带女儿来看病，发现女儿感染了。后来他们病房里面进了一个彝族女孩，吸毒感染的，中间是另一个汉族患者，这边是我们的藏族患者，这边有一个电视。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拿念经的佛珠之类的，我就帮他们找。我们做心理辅导的时候，就会说现在我们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药物比以前的药效好多了，而且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多，完全可以放心，虽然前三个月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这个副作用的。还有很多人的免疫力如果不特别低下，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才会有副作用。副作用特别强的也只占百分之四、五，比例比较小，大部分是没有太大的副作用的。然后，就会告诉他们宗教信仰的力量。

第二天我去见她们的时候，两母女念经特别厉害，然后我就发现病房里有一个电视，这个彝族女孩没有人照顾，很无聊，她离电视比较远一点，就要把电视声音放的特别大。而藏族母女就正面对着电视前面，她们两个特别生气，就念经的声音特别大，希望能压过电视的声音，就这样哒哒哒的念。我就说不能这样，如果你们念经伤害到了其他人，打扰了中间这个汉族人，这也没有任何功德的，你们要好好体谅一下人家。中间这个汉族女人有老公照顾，是非常体贴的一个男人，这边的藏族女孩有母亲有弟弟照顾，她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照顾，就难免天天心情不好。有些

时候打扫的人过来，先从这边扫，她在那边生气，就觉得为什么不来我这边扫，甚至把垃圾桶扔过来。这是因为她感染了这种疾病，再加上没有人照顾，心情不好，她绝对会这样。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对待她。后来我再去看的时候，不仅这个电视朝向了彝族女孩，她们念经的声音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就是默默地念经，而且有些时候，这个彝族女孩子输液药水快完了，这个母亲就去找护士，她不会说汉语，她直接拉着这个护士的手让她过来，后来彼此的关系就非常融洽。

我们面对的完全是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什么样的图案，完全由你自己这个志愿者的文化水平、愿力和心愿决定。如果这个方面愿力不足的话，可能在你出于爱心对人家做关怀服务时，都有可能伤害了人家。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我在妇幼保健医院这边给老百姓做导医的工作，我是每天都去的，因为这些患者不会说汉语，医生不会说藏语，我就带他们去做检测。但是那一天我太忙了，我就让我的爱人去帮忙。检查的结果下午才能拿到，一个患者说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我爱人去拿的，拿到结果后就发现是阳性。看到检测结果，我爱人比感染者还要紧张，浑身发抖，给我打电话，让我赶快赶快过来，这样紧张（笑）。如果志愿者告诉患者这样的检测结果，那绝对会造成冲击和伤害，感染者也许会有轻生的想法。我们自己也担心，也在乎检测结果，但是就要装成不在乎的样子，好像全世界人都感染了一样，就要跟患者说，让他不用担心。有时候就这样去碰他一下，说“谁没有艾滋病啊”。要让他从刚开始最极端的那种冲击中解脱，要在一周左右一定要把他带出来。这个时候也可以不谈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只谈抗病毒药物的一些好处。然后使他不接受这个结果，过渡到接受病毒感染这个事实。

接受自己被感染的现实是第一步。很多人是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的，就到很多医院去反复检查。有一个感染者先后到九个医院去检查，得到的是一样的结果，他就是希望有一个医院说你没有感染。所以一定要让他接受这个事实，面对这个疾病；第二步是要帮助患者面对生活，就是必须要服用抗病毒药物。到这个时候，就要告诉他用药的风险，刚开始时不能提风险，你一提风险，他就不接受这个药了，他就会轻生，自生自灭。有很多人在刚开始时不能提这个，慢慢地他就接受了。这需要一个过程，我是有教训的。以前我知道这个抗病毒药物的好处，我就鼓励人家去吃这个药，那个时候我的经验不足，后来出现了这个副作用，他就指着我的脸骂，说“共产党和你把我害惨了”。这种话的心理伤害非常大，他不是一般地说你是骗子，而是这样说你。

现在，我们把这个心理辅导工作做好了，患者自己来找我，说现在已经想好了，现在想通了，要吃药了。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当然希望他能服药，但是还需要问他：“是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再告诉他“有一些副作用哦”。告诉他：你自己生命的长短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这个抗病毒药物的药效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吃的話，可能就只有几年的生命，但是如果你吃了，能够很好地保证按时按量的吃的话，衣食住行方面注意了，完全可以把你的生命延长至20、30年。到那个时候，我相信世界上会有完全治愈艾滋病的药物，或者是发明出新的一些药。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上面不好好配合的话，你的生命绝对比不吃药还要短。因为药物刺激了病毒之后，如果你突然停下来了，病毒会猛增。

把这些话和他讲清楚以后，那时就不是我们让他来吃药，而是他来求我，这个转变非常有必要。他会说“放心，我现在已经准备面对所有的困难了，所有的都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吃这个”。“好啊，这是你自己说的啊，那你就签字。我给你介绍每一种副作用，然后写一个知情通知书”。需要有这么一个程序，到疾控中心去拿药的时候要有这个程序，那就每一个细节都向他解释，问他是不是每一项都清楚，然后每一项都签字，甚至我有一些时候让他们在每一项上面都盖手印。要让他有这个意识，因为这个文件上面盖上自己的手印，和简单地画个圈、划个勾不一样，他就更加重视了。他就一定要对此负责。

在很多疾控中心是没有这个要求的，但是我坚持说有这个必要。按完手印，我就对他们说，要好好地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然的话，就是出现一点点副作用的时候，患者就天天给你打电话，他们也不会考虑到你的时间。对于那些心理辅导工作没有做好的感染者，真的是有些时候很难缠，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有一个感染者，他先后发了53个还是51个微信语音，过一会儿发一个，口气就慢慢地变，他的变化可以完全听出来，刚开始是请求你，后来质疑你在不在线，再后来就有点生气，就觉得你怎么不理我，再后来就是……（笑）。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很多时候，如果疾控中心没有把这些解释好，就让患者吃药，吃药后很难处理，再才找到我们，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N: 比如说甘孜州的患者在这边检测，检测出来之后可以在甘孜州那边拿到药吗？

Q: 可以在康定拿，但是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在这边公共卫生部门如成都市公共卫生医疗救助中心去做前期治疗，因为他们是成都市性传染病医院，对这个疾病非常了解。他们也会开处方，会按照每个人的整体身体状况，根据他的肺脏、肝脏的情况来开出整体行的处方，这是最负责的方法。为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本身就有肝炎，乙肝转氨酶偏高，整个身体肝功能不全，用药就要非常小心。

一些抗病毒药物，尤其是市面上医院给的，我们叫做齐拉依、齐多夫定、拉美夫定、依非韦伦的药物，这里的齐多夫定在美国两年前就已经定为禁药了，在北京现在已经拿不到了，去年已经没有了，在藏区很多时候这个也拿不到。这个药一般对人的副作用不是特别大，但是一个肝炎患者，给他就等于杀了他，因为这个药对于肝脏的副作用非常大，本来肝功能不全、有肝炎、有肝硬化的人，那就等于杀了这个人，这药就必须替换成齐多夫定或替诺福韦。依非韦伦这种药，如果是一个有身孕的妇女，吃了这种药，那生下的小孩绝对是畸形。还有就是有的女孩子有一些妇科病，严重的如雌性激素、卵巢、内分泌紊乱等这些现象，你给她开依非韦伦这种药，那也等于害了她，那就需要把依非韦伦换成奈韦拉平之类的药物。但是甘孜州、阿坝州、青海的用药很不靠谱，一律都给齐拉伊，也不管这个人是什么一个状态，因为前期检查不是免费的，而且疾控中心也没有这个条件。因此在很多的时候，病人自己需要掌握一些知识。

N: 像地方上的那些疾控中心，很可能没有做这种检测的条件啊。

Q: 如果心好，对病人负责的话，你可以给他先做这个前期检查，把检测结果拿来，我就给你开药，但是不做检查，你来了就发药，觉得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愿意咨询求医的人，再要求他去检测，可能以后来的人就少了。……疾控中心是有指标的，必须把感染者要求上药的人数提高。像甘孜州的这个数据你可以写下来，到时候你可以去甘孜州疾控中心去问问，今年这个数字肯定有增长，甘孜州有337名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药物的有三十个。

N: 这么少？

Q: 如果国家疾控中心知道了，这就是他们工作的失职，因为还不到百分之十啊，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是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愿意服药的，让他去做体检，说不定这个人就不再上药了，觉得麻烦啊之类的，这是我们藏族人的通病，绝对会有这类情况。疾控中心的人也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来了一个人就直接上药，就不检查他有没有其他一些疾病。但是这样对病人就是不负责任的。我希望以后可以在这上面改进，既然抗病毒药物是免费的，国家应该规定对前期检测也应当免费，疾控中心应当配备检测的设备。这个如果不改变，情况很难真正改善，很多藏区的疾控中心，像理塘县疾控中心的一个副主任很积极，也和我们志愿者联系，他们虽然是藏族人，但听不懂当地人的话，真的是心非常好，就是没有检测的条件。如果通过你的这个调查报告引起一些改变的话，那是最好的。

N: 所以像在甘孜、阿坝、青海藏区都没有这种检测的条件？

Q: 没有，完全没有，青海的情况更差。青海不用说了，在阿坝州有一个CD4的检测设备，这个检测设备在马尔康是有的，但是甘孜州没有，青海的果洛、玉树、任何一个州都没有。

N: 这个检测困难吗？

Q: 不困难，这次如果我到州医院去工作，我绝对会让州医院买一个，只要十万块就可以了。

N: 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开支啊？

Q: 不是特别大, 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还有一个就是, 在决定了这个人是马上服药还是等一段时间再服药之后, 以后就不管患者的CD4level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上药。这个CD4level就是判断上药的重要标准, 但是他们还没有这个条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哪里能够拿到药, 在甘孜州和阿坝州的人可以在州上拿药, 青海玉树这些地方必须要到西宁去拿药, 很多感染者家庭状况经济都不宽裕, 再加上有病, 劳动能力下降, 本身就有困难, 然后再让他们去省里拿药, 青海玉树等地方的藏人不懂汉语, 又不懂具体在什么地方拿药, 而且青海的医生态度差的不得了。所以这些地方的患者就非常非常困难。

N: 老师, 我以前看过一些文章, 说有一些地方存在家人歧视患者的情况, 在藏族群体里也存在这种现象吗?

Q: 有的, 所有的排斥等这些现象都来自于无知,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不了解, 对什么样的行为不会传染这些知识都不了解, 这个也可以理解。这说明我们这些志愿者的工作没有做好, 疾控中心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些现象不能抱怨老百姓, 不能抱怨我们这些藏族人, 是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而且和寺庙也有关系。

N: 寺庙为什么会有关系?

Q: 寺庙应该带头做这个方面的宣传嘛。既然是寺庙, 是惠及众生的一个机构, 有这么一群人, 就应该做这些事情。你不做这个, 然后天天说为全天下所有众生……。如果这方面没有做好, 那不都是假的话! 还有一个应当参与这项工作的群体就是藏族知识分子。说我害羞和不好意思谈艾滋病的问题, 说我没有这个条件, 你如果这样说, 那你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就等于是故意杀人。我现在真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比如说我现在知道了藏区的卫生状况, 知道了感染者的状况, 我明明知道了, 但我就是不去做这个工作, 而去做另外一些事情, 我真的是有一种犯罪感、负罪感。我上次在单位辞职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呢? 因为环保工作虽然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明明知道有这个艾滋病还做环保工作的话, 真的, 我觉得是太不道德了。

在这方面, 只要寺庙能够为老百姓负一点责任, 有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我给你讲一些例子, 我特别希望你能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在德格县有一个案例, 藏区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 不过你在报告里不能写他们的名字。有一个德格县的感染者在感染之后, 被老百姓赶到山上, 他是一个在家的俗人, 有老婆有孩子, 全村的人给他穿了一个僧装, 然后让他去山上闭关, 他对此没有任何自由自主权, 就是强制性地送到山上。后来我们就打听, 问他现在是在哪里? 他们说这个人应该死了吧, 又没有吃的。这个人肯定不会在山上闭关, 一个那么多年的俗人不可能修行修出什么东西, 他偷偷地跑到甘孜那边, 就在那边生活。后来他就放出这样的一个人话, 他说如果我感染了艾滋病的话, 所有藏族人只要去了成都都会感染。这就造成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就担心可能到了成都都会被感染。所有家里有人去过成都的, 都担心这个人。这个事闹大了之后, 他又改口, 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跟他一起去的有四个人, 我们四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一样, 我说的只是这四个人。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 我们藏族人一般都会这样, 以此为荣, 比如说你老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我就说我睡过这个女人, 我们两个是这个关系。这个人这么一说, 那个丈夫就生气了, 然后就打官司, 还打了老婆, 老婆坚决不承认, 说我都不认识他。这个丈夫就来找我, 要去打官司, 说如果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那个人就得给他三万块, 说这个要求是很低的, 如果没有感染的话, 也要给三千块。其实讲这个话的人根本就是说大话, 他说我睡过这个女人, 又感染了她的上学的孩子, 她有两个孩子。于是他们全村的人, 全乡的人, 有两百多个小孩都从学校里面带出来了, 村民们说如果这两个孩子上学的话, 我们的孩子就不上学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德格县。后来我专门到德格县当地的乡政府去问过, 核实过这件事是真的。后来他们也通过我在成都给这家人做了检测, 发现并没有感染。后来政府就去做思想工作, 让他的孩子继续上学, 其他孩子也继续上学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担心, 完全排斥这两个孩子, 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玩, 这些孩子的心理因此受到多大的伤害, 真的是难以想象。

所以今年的“防艾万里行”我联系了当地的政府和当地的寺庙，但是政府那边没有批准，后来我拿到了德格县的批准，但是那时老百姓已经上山去挖虫草了。我打算今年什么时候去一趟，可能九月份去更好。这个案例是藏区非常典型的藏族人的想法。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在西藏的那曲地区，整个村庄排斥一个人，不让他进村。但是那曲地区我们去不了，我们也培养了一些志愿者，但是在那曲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你们东三县，政府在这方面非常不作为。

N：而且会对志愿者进行管制，不允许其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那里做宣传。

Q：对，他们说这些活动是违法的，而且把有些志愿者还抓进去教育了好多天。他们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艾滋病，不要来宣传。如果你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跟这些志愿者联系。有一个感染者，进了岔路就被赶出去了。

N：但是他们是感染者的身份怎么会被别人知道呢？

Q：这个感染者是他自己说出去的。他以前偷东西被抓进去，被抓之后，当地派出所给他检测，后来在释放的时候也给了他确认艾滋病的检测报告。他自己不知道当地老百姓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他出来后就说，我被抓进去是因为艾滋病，他是为了掩盖自己偷东西的事实。所以老百姓完全相信，如果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政府就会抓走。

N：这个人是在哪里？

Q：红原县，阿坝州红原。

N：像这种感染者的数据是检测出来的，如服用药品的三十个人。那就是说，如果不是检测出来，就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用药，他既然已经被检测出来，难道不会服药吗？

Q：这就说明疾控中心不负责任。你可以跟我们的一个志愿者联系，我上次已经和她说好了。她是我们最得力的一个志愿者，叫准尕措。到时候去哪一个乡，她会告诉你，应该是若尔盖的一个乡，到时候她会带你去，这个地方有七个感染者，去了后你们给他们讲服用抗病毒药物的重要性。她前前后后去了二十次之后，她才觉得老百姓真的了解了。很多时候，讲了一次两次，她觉得老百姓虽然在听，但是没有听进去，老百姓的接受能力就是这个样子，不能说一次讲完就可以了。她告诉我当地感染者的数据。有些时候我脑子里的数据可能有错，可能是四十七个还是五十七个。

感染者来找她的时候，就问，老师能不能看一下这个诊断结果，医生说我的血不干净，但是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不干净，是高血压、高血糖还是高血脂。他们连这些都不知道。检测的机构根本就没有告诉他这是个传染病，是艾滋病，一定要服用抗病毒药物，都没有讲。连他得的是传染病，不要跟老婆发生性关系，这些都没有讲，只是说你的血不干净。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事情，我特别希望你能把志愿者的经历也体现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刚才这个女孩子，她以前在英语师资班，她的汉语英语藏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真的是这样，她之前当老师，哪所学校我忘了，自从就是听了我们这个宣讲课以后，她就放弃了工作，专心做志愿者。她本来有六万块钱，想出国留学，她放弃了这个机会，后来就慢慢慢慢花这些钱，做防艾工作。这个结果被她的继父知道了，继父对她的态度现在非常不好。前几天一个感染者特别信任她，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志愿者有时说话听起来不太好听，这个感染者就求这个女孩子帮忙，要去北京治疗，他因为免疫力低下，两个眼睛都失明了，希望能去一下北京。我们的这个女孩子带他去北京，那时发现准尕措自己已有身孕，有六个月，然后他们就在北京各大医院求医，我帮她联系了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带这个感染者到最好的医院去治疗，都没有用，免疫力低下就没有办法。由于太辛苦，回来以后这个志愿者的孩子就流产了，而且她自己差点死了。

还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我刚才联系的这个志愿者，他以前是警察，真正的警察，先当过兵，后来参加考试，当警察已经几年了。他说他以前每个月还可以给父母两三千，然后自从参加了我们这个“洗脑”的活动后，就把工作辞掉了，全身心地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就因为这个，不仅给不了父母钱，每个月还从父母那里拿两千块左右，他姐姐现在都不理他了，亲姐姐就不理他了。

还有一个石渠的志愿者，我希望到时你能见到的，你讲拉萨方言他能听得懂，他的汉语不好。但是他以前去过印度，我一直这样想，去过印度的人是藏族人弱势群体当中的弱势群体。因为这些人即使再有文化、再有想法、再有爱心，也得不到重视，这些企业等单位都不敢雇用，害怕政治影响。所以没有出力的机会，他参加了这个“洗脑”活动之后，就全身心地做志愿者。因为当地的教派属于格鲁派，而支持我们这个工作的是宁玛派，是慈诚罗珠堪布和索达吉堪布在支持。当地的寺庙对他说，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你爸爸去世了，我们就不给你们念经，这种话都说出来。他爸爸后来就求这个志愿者，让他不要再做这个工作，说我现在也身体不好，你参加了这个活动，那我以后怎么办！这个志愿者就骗家里人，说我现在没有做这个，我现在在卖光碟，在做生意。一个月慈诚罗珠堪布给他两千五百块的补贴，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根本不够用的，但是他还是需要从这个里面给家里人一些钱，就是为了掩盖这个事情，说我在做生意。但是后来还是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还有一个人以前是和尚，差不多快到一个堪布的地位了，色达五明佛学院里念经时候带头的那个角色，他的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还俗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的活动，还俗的人和从印度过来的人同样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在寺庙里修炼好了爱心、慈悲心、菩提心，但是他们在当僧侣的时候被人供养，然后习惯了，一下来就没有人尊重他们，甚至歧视他们。如果心理素质不好的话，得忧郁症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即使没有得忧郁症，但是一下子落差太大了，很多时候人会变得特别坏，就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在藏区可以在一些还俗的人里看到，那些没有解决好自己定位的人，就变得对宗教这些都特别叛逆。这些人参加我们的活动后，就发现这也是一个获得社会地位的途径，会得到老百姓的尊重，他具有的知识 and 爱心就有发挥的余地了，这就是他人生中实现自己的最好方法，既可以有老婆有孩子，又可以发挥他长期以来学到的知识，所以他就一直在做志愿者，但是他有两个孩子，老婆没有任何经济收入，而且他的父亲母亲都是生病特别严重的。比起他们，我自己真的都不敢说什么了，他们非常了不起，真的是这样。

还有一个志愿者，以前每次志愿者培训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照顾一些感染者。我说我们没有照顾过、接触过一个感染者的志愿者，就没有权力说自己是防艾志愿者。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做这些志愿工作的，因为没有接触到这些感染者，他们说话是不负责任的。甚至青海藏医院有一些老师在青海卫视上面乱讲，把很多麻风病、梅毒等很多性病的照片直接放到这个电视上面，说这是艾滋病的症状，到了什么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这就把整个藏族对艾滋病的观念一下子倒退了二、三十年，真的是这样的。现在感染者受到歧视也是因为这些错误的宣讲，青海卫视在藏区非常有影响。

所以我就对我们志愿者说，你们一定要照顾这些感染者。但是有些时候他们说，一个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去照顾一个病人的话，会有感染的风险。我认为，如果你没有这种即使感染了也不害怕的勇气或者是决心的话，你就不应该来做志愿者。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真的是这样想的。但是如果真有一个志愿者感染了，这是我非常担心的。现在我越来越在这方面担心，因为像刚才我说的准孕措，还有我说的几个志愿者，因为他们太了解艾滋病了，就开始变得不害怕了，然后照顾病人的时候就不怎么注意。这是特别危险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感染了艾滋病，那不是你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全藏区的人都在看着你们，如果连你自己都感染了，那老百姓就说我们就没办法预防了，连那么懂艾滋病的人都感染了。

本来就有很多老百姓认为，得这个病是人的命运，是命运安排的，只要我一生里应该得艾滋病，哪怕我在山洞里闭关，都会感染艾滋病，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的命运里没有，就算我去做性工作，也不会感染，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的志愿者感染了，那就真的是非常不好。有一个志愿者说，他们一直下乡去给老百姓宣讲的时候，就因为民众有这样的心理，他们就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觉得我们藏区山高水清，空气清新，天气寒冷，艾滋病病毒在藏区会自己死掉，或者是不会存活。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是很多高僧大德出生和修行成就

的地方，这么一个圣地是不会有艾滋病的，很多人说我们藏族人吃的是牛羊肉，牛羊吃的冬虫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我们藏族人的身体素质比汉族人强，所以以各种理由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宣讲。

我们每次在志愿者培训活动中都会邀请一些感染者，让他们讲他们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这时我们有的志愿者就会发愿，说我要感染艾滋病，感染艾滋病之后，也要像这个宣讲的感染者一样，让老百姓看我的症状，求求他们让他们注意一下自己，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我这样，这真的是……。这样的志愿者，我真的觉得是太了不起了，但是我是当场骂了他的，我说你连自己都不会保护的话，你怎么保护其他人，我说这是志愿者的耻辱，一个志愿者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但是没有这样想，我觉得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我觉得当时的那一刹那，他肯定是这样想的。但是后来我就慢慢发现，这个人再也没有做防艾工作，我相信他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志愿者，后来没有能够继续做下去。我觉得对这些现在正在做的和没有做的，你都应该采访，可能没有能够继续做下去的人，他们有更多的故事告诉你。防治艾滋病工作不容易，我相信他们只要有这个决心，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别人也支持理解他们的工作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放弃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工作的。

（看知情同意书）

Q: 你写的论文如果在图书馆保存，全部都使用化名，是吧？

N: 全部都是化名。

Q: 疾控中心了解的情况可能都是农区的。因为农区的人汉语水平好，疾控中心在哪里，他们都了解，也更愿意去求助。牧区的人不掌握汉语，不知道疾控中心在哪里，不知道去了怎么说，也没有健康意识，根本就没有自我咨询检测的意识，农区相对而言，要更好一些。牧区的病情更危险一些，牧人一旦把这些疾病带到这些地方，那是非常可怕的性活跃地区，人们在观念上极其保守，但在行为上又极其开放。

C: (中途加入) 你们的家乡怎么样？是不是也是牧人的性生活比较开放一点？

N: 对，像那曲这些地方也是非常开放。

Q: 那曲可能是全藏区性工作最多的地方，而且是性混乱。

N: 听说那边得性病的特别多，而且很多人自己不知道。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当医生的，医生在做手术之前，必须要知道患者的病情。但是很多病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直接上手术台，上了手术台之后，就发现患者有性病，所以就换一种处理方式。

Q: 所以如果医生有这个检测试纸的话，无论是伤口处理也好，还是做一些微创手术也好，医生提前知道患者有艾滋病，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啊，医生可以保护自己。如果这个病人患有一些传染病，医生自己也会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如果不知道，不做防护措施，那危险是很大的。

C: 你的论文就是调查这些数据？

N: 不止是了解数据，我想了解现在为什么艾滋病的形势会发展到这么严重，我们的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包括政府官方的疾控中心、医院他们在做什么，老师和志愿者们他们在做什么，到底效果怎么样，包括造成这些效果的原因。如果真的要吧这项防治工作做好的话，肯定政府和各方面都要合作，这里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包括在进行防艾宣传的时候，为什么老师他们宣传的效果是这样，而政府方面的宣讲教过为什么是那样？

Q: 我们的还俗防艾志愿者做宣讲，尤其是女性志愿者到社区去宣讲艾滋病，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摸索出来的这个经验，在藏区之前是没有的。一个女性在很多人面前宣讲防治艾滋病的知识，这是从来没有的。

C: 这是一件会让大家害羞的事情

Q: 一个没有出过家的人到寺庙里面去宣讲，到其他的老百姓面前去宣讲，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情。我们现在有330多名志愿者，其中有22名志愿者，我们称他们为专业志愿者，全日

制做这个工作。这几个志愿者都是这22名志愿者当中的，他们分布在藏区各个地方，在基层，几乎是每天都在给老百姓宣讲，有些时候在这边，有些时候在那边。但是今年的九月份，我们会有一个志愿者培训班，那个时候他们都会一起过来，你可以见到他们。十一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志愿者培训班，那个时候你可以进行采访，但是其中的一个志愿者，我刚刚也说了，因为教派的原因不能继续参加的这个人可能来不了。今年本来是计划在五月份开展的一个活动，政府在五月份没有得到批准，后来就慈诚罗珠堪布也出去了，就有点难。十一月份是每年都会有的。这是必须的，他们都会参加。

N：藏族里面的传播途径主要是性传播，吸毒之类的情况有吗？

Q：吸毒的人比较少，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当地的医生，不注意，通过针头传播的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藏族的感染者当中，年龄最大的八十三岁，这个人肯定不是通过性传播的。

C：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村里村医，一个针头一个人接一个人的注射，你想象一下。

Q：藏区像我们家乡都是一样的，消毒其实很容易。上次我给你看过照片，一个女孩子，医生直接从她的藏袍上面扎针，不要说没有消毒，血管都没有找到，后来这个女孩子瘫痪了。这个女孩子你应该采访一下，她倒是没有艾滋病。

（期间来了个学生，要给十一世班禅大师写信，交谈了相关内容）

他们希望给新的班禅大师写一封信，请他关注关于藏区艾滋病的情况，他们想写一封信，让我帮助他们，我就帮助他们写了相关的内容。他们也是我们的志愿者。一是希望班禅大师在大法会的时候能宣传有关艾滋的问题，希望有一些能和各寺庙的主持们交流的机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班禅大师的母亲好像也有一个组织，希望能够和防艾工作结合，给百姓宣传和做检测，然后第四个就是能够在卫藏当地培养有关防艾的志愿者，进行艾滋方面的宣传，并且帮助当地的艾滋感染者能够像我们一样工作；第五个就是西藏的藏医和传统科学能够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和投入。就是这几点内容。

N：在西藏，目前索达吉堪布和慈诚罗珠堪布二位大师投入了很多心力在防艾上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高僧大德也在做这些事情？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

Q：像他们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心力物力的其他大师还没有，但是现在各教派的很多高僧大德在这个范围宣传防艾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像以前。像刚才这个志愿者的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这种越来越少了。我相信以后，只要当地身边出现了感染者，我觉得不会有一个僧人拒绝帮助他。很多时候老百姓都不相信藏区有艾滋病，觉得我们这么圣洁的地方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不能告诉人家，在什么地方有多少感染者，谁和谁是感染者，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老百姓不相信，觉得自己离艾滋病很远。但是你到青海果洛的拉加这个地方，有一个寺庙，晋美尖措学校旁边的拉加寺专门成立了一个防艾小组，而且是我们重点培养的一个团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在青海果洛那边，他们目前为止只接触过一两个感染者，全程都是我在教他们怎么处理。但是有一个女孩子的孩子肯定是感染了，她老公坚持说没有感染。这种案例也是有的，只不过不能给老百姓讲这种案例而已。很多老百姓觉得自己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你到青海那边去的话，我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感染者。

N：老师，我在面对感染者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我怕我有些不恰当的语言和举动会伤害到他们。

Q：是有一些技巧，但是有些太刻意的技巧是比较机械的，如三看二摸这种，汉族地区公益组织里有很多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并不好，你要做的，就是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不要过于地关注和在意，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做，那就把他异类化，这个是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你自己不担心的话，就跟他握个手，然后一起坐下来一起吃个饭，都不会有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安慰。然后也不会要求他们写身份证号码，这些是不需要的，你把这个解释好了，说你是邱华绒吾的朋友，在做这么一个调研记录，说我们一直在做，这样他们就更相信你。把记录给他们

留一份，他们自己拿一份就不会有问题。然后可以问他们是怎么感染的，感染之后有没有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有些人愿意谈。你就慢慢地在交谈过程中会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愿意放得开的人。对于一些很重要的话题，问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即使你发现他们说的是假的，你也要点头，这是对他们的尊重。我自己就是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是经性传播的，可能会说……自己在某些方面不注意等等。比如说一些女孩子可能会说，自己是被丈夫传染的，她们说这种话的时候，你尽量跟她们说，这个也不一定，你自己不小心通过针头感染都有可能，尽量不要激化夫妻之间的矛盾。

我们有一些原则，我们的志愿者第一只是防艾志愿者，不是防艾警察，我们没有权力说谁是犯罪的，谁是有错误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力。然后我们是一个道友，就是给他们说这边有疾控中心，那边有艾滋病医院，你要去的话我们可以带你去，仅此而已。我们不是研究人员，也不是医生，不能替他做一些决定，我们也不是这种领导、老师，骂他们，想改造他们的心理不应该有。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比你们有文化，比你们干净，有这样的心态就不好。我相信这方面你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在创造和谐，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们不能质疑家属之间的关系，感染者之间本来就是埋怨、生气、憎恨，觉得自己老公出去不检点，然后觉得自己家里亲戚朋友排斥他，觉得自己家里没有任何阳光，天天满脑子里都是黑暗的这种。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三个原则，第一个是世间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世间不缺少幸福，缺少的是感知幸福的心灵；世间不缺少财富，缺少的是挖掘财富的勤劳的双手。这些我们都缺少，所以在你采访完了之后，对他们来说，也是心灵启迪的一个过程，然后让他们不仅把心里面的痛苦，在你面前发泄出来，还能学到了一些知识的话，那就是最好的，这也是我接受你的工作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我相信你能做得到。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帮助到他，如果还能帮助到他们家庭的和谐，那就更好了。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跟他们说，其实你不能怪你们的家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无知，你的父母亲戚朋友是对艾滋病知识不了解才疏远你，如果他们了解了，他们掌握了这些知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真的是这样的。我始终觉得没有把这些知识传递好，真的是我们志愿者的错。一个人犯罪，全世界的人都有错，真的是这样，都是有错的。所以要尽量在这上面搞好关系。

第二个要使感染者与医院、疾控中心和谐相处。很多人对医院的不满，医患关系不要说藏区，在整个中国都是问题。但是医患关系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也有很多医生真的是非常不负责任，而且没有素质。前几天我帮助了一个藏族僧人去做艾滋病检查，他有肺结核。肺结核之后呢，在成都这边就专门到三六三医院来看病。对一些肺结核患者，医生叫他们打人血白蛋白，医生给他们一个名片去买人血白蛋白，这个名片上的人是三六三医院门口蹬三轮车的一个人，从他们手里买的。在三六三医院、华西医院都有这种现象，这些人在卖人血白蛋白。这种情况在华西医院也存在，你应该记下来。

这个僧人后来打完之后，越想越担心，然后我们两人去做检查，做检查的时候，当地疾控中心的人看到这个僧装的患者，就用特别瞧不起的眼神说：“你去嫖娼了吗？”“没有”。“你是同性恋吗？”“不是”。“那你吸毒了吗？”“不是”。“那你来干嘛？”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没有素质，这种对话对一个僧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嘛，你嫖娼、吸毒、同性恋了吗？再没有比这个更伤人的话，所以他们对医院、对疾控中心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可以委婉地告诉他们说，疾控中心其实也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什么资历，很多这个检测，他们也没有这个条件，然后他们是非常想给你们做一些服务，但是我们自身上不卫生，不洗澡，我们臭烘烘地到他们那里去，对人家来说也是不尊重的，要尽量在他身上找一些问题，这样来平衡他的心理。民众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也是存在的，在这上面也需要平衡。这些要长期积累经验，长期打交道就会知道的，这些感染者自身的毛病怎么去找，然后努力使这些毛病不被激

化，提到这些时，不让他感受到讽刺，让他感受到健康、卫生、洗澡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不要对医院、医生产生憎恨的心态，能做到这一步，那你就太厉害了。

所以现在僧人来检测，我不会让他们进来。抽血一定要自己来，但是前期的这些跑腿联系的事，都是我自己来办。这个人要去皮肤性病科检测，一个喇嘛从皮肤性病科出来，其他藏族也会这样看的。所以我就尽量不让他们去，尽量我自己跑，所有的科目都去跑，查血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这个人在查什么，除了前面的那些人以外就不知道。这些人是有职业素质的，他们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感染者来测的，所以即使是做HIV检测的，也不会这样。

N：医生中有没有藏族的医生？

Q：没有啊

N：因为我还想看一下，一般医生在做 HIV 检测的时候，对病人是什么态度呢！

Q：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

【书讯】

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中的实践与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

祖力亚提·司马义 著

绪论

1. 问题缘起, 2. 文献综述, 3. 分析框架, 4. 重要概念辨析, 5. 研究方法

第一章 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实践中的制度安排

第一节 新疆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新疆民族教育的制度安排

第三节 小结

第二章 双语教育政策的实践效果

第一节 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

第二节 双语教育概念的界定

第三节 新疆双语教育的历史变迁

第四节 双语教育的个案研究——乌鲁木齐高级中学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教育优惠政策的实践效果——少数民族教育与教育成功

第一节 民间成功概念

第二节 民族教育的制度安排

第三节 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优惠政策

第四节 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的个案分析——新疆大学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国家认同教育政策实践效果

第一节 族群认同及其演变分析视角

	第二节	公民教育
	第三节	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
	第四节	学校教育情境中的族群认同
	第五节	一个特殊群体的认同
	第六节	小结
第五章		民族团结教育政策的实践效果
	第一节	族际关系演变的宏观理论视角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学校场域中的族际关系
	第四节	小结
第六章		新疆民族教育政策探讨之一：高等教育“民汉双轨制”向“民汉一体化”教育转型
	第一节	研究现状
	第二节	推进“民汉一体化”教学的背景
	第三节	“民汉一体化教学改革”个案分析——以新疆财经大学为例
	第四节	新疆大学“民汉一体化”本科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
	第五节	小结
第七章		新疆民族教育政策探讨之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公民教育
	第一节	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讨论
	第二节	多元一体格局
	第三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22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